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

通 讯

第 12 期（总第 347 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2018 年 12 月 5 日

-
- ◆ 纪念农村改革 40 年.....郭书田（1）
 - ◆ 依靠学习和实践走向未来.....丁玉华（8）
 - ◆ 北大荒精神的锻造者与践行者.....胡中禄（13）
 - ◆ 欧洲生态文明建设的崭新途径.....王兴成（20）
 - ◆ 聚焦生态脱贫，助力脱贫攻坚.....郑治豪（22）
 - ◆ 中国乡土社会正在发生十大转变.....刘 奇（33）
 - ◆ 《准则》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卢继传（35）
 - ◆ 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创新：1978-2018.....孔祥智（45）
 - ◆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维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郭书田（54）
 - ◆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南京市都市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蒋晓平（56）

纪念农村改革 40 年

——从理论上总结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

郭书田

在人类历史发展长河中，有多种的政治经济学，它是与社会制度的变迁相应而生的。在近代，除了西方不同学派的政治经济学外，出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政治经济学、斯大林政治经济学以及毛泽东政治经济学等。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占主导地位，中国受其影响是极大的。1952 年出版斯大林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与列昂节夫编著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全面系统地论述了斯大林的政治经济学，成为社会主义实践的理论依据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占主导地位的权威著作。

今年是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共产党宣言》发表 170 周年，我们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明年是新中国建立 70 周年，“五四”运动 100 周年。回顾历史，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总结农村改革的经验，对正面的要充分肯定，对负面的也不能回避，都是宝贵财富，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

一、农村经济体制演变历程

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经过 28 年艰苦卓绝的奋斗，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在革命战争年代，农民作为军队的主力，牺牲最大，建立了新中国，开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这是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缺乏经验，只能以苏联为师，全面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在完成土地改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后，不失时机地把农民组织起来，走上互助合作化的道路，从互助组（由临时季节性到固定长期性）到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相应的供销合作社与信用合作社，形成“三足鼎立”的合作体系，受到农民的欢迎，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很快使粮食等农产品超过战前水平。但是，在 1956 年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一化三改”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农民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为工业化提供了巨额的原始积累（9494 亿元），并以多种茶叶出口创汇，偿还苏联援助工业项目的贷款与利息（3.29 亿美元）。而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尚未完全巩固的情况下，批判了“反冒进”与小脚女人走路，支持山西省委最早提出动摇私有制，在全国以消灭私有制为宗旨，急剧地以行政手段把农民所有的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无偿地转为集体所有，被视作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与此同时，把供销社与信用社异化为第二国有商业与农业银行的附属物，伤害了农民的切身利益。时隔不久，在 1958 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中，产生了“一大二公”与“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宣传“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建立了三级所有（生产队——

生产大队——公社）、队为基础（把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四固定到生产队）的体制，作为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与公社过渡，由集体所有公社向全民所有公社过渡，由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向共产主义全民所有过渡的组织形式。在“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中，刮起了“五风”（瞎指挥、高指标、特殊化、浮夸、共产平调），农民深受其害，有的地方征购过头粮，发生了非正常死亡的悲惨事件（1959—1960年人口减少2139万人）。在“农业学大寨”中，有些地方把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转为生产大队的“穷过渡”，把自留地、家庭副业、农贸集市视为“资本主义尾巴”予以取缔。对此，在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中，予以纠正，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这项制度持续了20年，其中包括作为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文化大革命”在内。应该看到，农民在这种环境中发挥坚韧不拔的精神，以赤手空拳的劳动，增加了粮食产量，维持了城市居民按定量供应最低的基本生活需求；大兴农田水利建设，兴建水库与梯田，增强了抗灾能力；大力推广“双杂”（水稻、玉米）优良品种，从国外引进13套年产30万吨大型化肥设备；依靠兴办的社队企业，实行以工兴农建农补农；举办“五保户”（鳏寡孤独与残疾）、“敬老院”“赤脚医生”等社会福利事业。十年的“文化大革命”使国民经济走向崩溃的边缘，而在农村，农民顶着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压力，坚持生产，使粮食产量有所增加（1966—1976年粮食产量有2.14亿吨增加为2.86亿吨），为社会的稳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进入改革开放年代，以农村为突破口，在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指引下，解放思想，农民突破一个又一个“禁区”，创造了土地的“包干到户”，异军兴起的乡镇企业，民主政治建设的“村民自治”，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集体经济产权股份合作制等，带动了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是邓小平理论的胜利。这些农村改革的创造充分体现了中国农民的毅力与智慧，敢于冒极大的政治风险，能以简易的思维方法，解决了关系农民切身利益极为复杂的问题，为人们始料不及。这些创造在理论上改变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使中国进入经济、社会转型的新时期，尤其是农业与农村的转型，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增添了新内容。40年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先后发了20个一号文件（改革开放初5个，党的十六大以后15个），总结了农村创造的经验，指导了农村改革与发展。

二、农村经济社会转型主要内容

- （一）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 （二）由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 （三）由自给半自给产品经济转为商品经济；
- （四）由公有制转为多种所有制；
- （五）由单一按劳分配形式转为多种分配形式；
- （六）由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转为政社分设、建立村民自治组织；
- （七）由生态环境恶化转为生态文明建设；
- （八）由单一的农业转为一、二、三产业融为一体；
- （九）由城乡两种户籍转为城乡居民统一户籍；
- （十）农产品由统购统销转为市场自由购销；
- （十一）宏观调控由行政手段为主转为经济与法律手段为主；
- （十二）农产品贸易由单一的国内市场转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

农村经济社会转型，在 40 年以来的改革中取得了很大发展，而尚未完成，转型的任务仍十分艰巨，转型实质是一场深刻的经济、社会、政治革命，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中国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具有 5000 多年的历史。勤劳、勇敢、智慧的农民创造了灿烂的东方文明，包括黄色的农耕文明，白色的游牧文明，蓝色的渔业文明，形成内容极为丰富的传统农业，对世界农业文明的发展发挥了引领作用。诚然，这种农业文明是在封建社会制度下延续下来的，一直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直到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产生的先进农业技术，包括以孟德尔、摩尔根基因理论为依据的农畜品种改良技术，以李比希矿物营养理论为依据的化学肥料技术，以及以动力机械理论为依据的农业机械技术等开始传入中国，使传统农业注入了新的要素，但发展十分缓慢。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三种技术得到长足发展，使中国农业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体制的转型，农业有了高速的发展。1949 年与 2017 年相比，人口由 5.4 亿上升为 13.9 亿，粮食总产量由 1 亿吨上升为 6.2 亿吨，人均产量由 200 公斤上升为 450 公斤，GDP 位居世界第二，人均 GDP8000 多美元，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中国以占世界 9% 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 22% 的人口，人民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绝对贫困人口大幅下降。在 2008 年亚洲金融危机中，有 2000 多万农民工下岗返乡，因有承包地而未发生社会动荡，受到国际好评。

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是从农村开始的，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这一转型以经济为主，又涉及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转型，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是空前的，可以说是顺应世界潮流的转型，是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与上层建筑适应经济基础规律的转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转型。当然，这个转型尚未完成完善，仍处于动态发展中，重要的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6 年是孙中山先生诞辰 150 周年，他在生前有两句名言：一是“顺应世界潮流，合乎民众需要”；二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仍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曾说这是万里长征走完的第一步，“进京赶考，不当李自成”的考验仍在进行之中，自强不息，不怕牺牲，艰苦奋斗的长征精神永远走在路上，成为激励人们奋斗、深化改革不息的强大动力。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农村改革基本经验及理论的思考

2018 年农村改革 40 年，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研究思考理论问题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一是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与上层建筑必须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这是不以人们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否则就要受到惩罚。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社会主义是在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实现。而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是在一个落后的俄国实现的，人们都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产生出列宁主义。列宁在结束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把余粮征集制改为征收粮食税，实际是一种补课性质，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经过 74 年而解体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的，生产力水平比俄国还要落后，能够依靠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夺取革命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有别于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而关键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革命，在经济上实行五种成分共同发展，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必要条件，应该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绝不是在很短

的时间内能够完成的，不能急于求成，欲速则不达。那种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变革生产关系，必然会破坏生产力发展，被迫停下来加以整顿，同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在新中国建立以来，实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在生产力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急速地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把多种所有制变为单一的公有制，提出一些不切实际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口号，导致“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失误，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以农村为突破口实行改革开放是对这个失误的纠正。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与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判断，着力发展生产力，促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二是消灭私有制，是《共产党宣言》中为无产阶级提出旗帜鲜明的斗争口号，这里指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也就是由无产阶级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形成的所有制。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奋斗的目标，并不是消灭劳动人民的私有制。相反，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特别强调农民要经过联合起来的合作社形成命运共同体，而不能剥夺农民的财产，不论有偿或无偿，也不论采取暴力或非暴力，只能通过“示范”与“社会帮助”。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要使无产者变为有产者，不能永远是无产者。当然这种有产者是无产者的劳动所得，而不是占有别人的劳动果实。马克思、恩格斯特别强调，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必须与劳动者利益密切结合起来，才会有活力。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把“吃大锅饭”的公有制同劳动者的利益分割开来，农民变成依靠工分获得收入的劳动力，出现“搭便车”、“磨洋工”、“出工不出力”与“三个一样”（干与不干、干好与干不好、干多与干少）现象，就是对这种“体制”的逆反行为，也是形成“短缺经济”的重要根源，从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坚持了20年之久。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创造的土地包干到户只获得了生产经营自主权，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工农业发展，但未能解决实际上是由乡村干部操纵的集体经济所有权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在“姓社”与“姓资”尚未清晰的情况下，从党的十六大起，不断提出探索集体经济产权的有效实现形式，十八大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随后进一步提出土地的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落实集体所有权不变。但如何落实集体所有权不能空置与改变农民主体地位虚化问题，并未真正解决。有人认为集体所有土地股份化就是“私有化”，而政府与乡村干部又不肯放弃既得的制度权力，这是农民穷的病根，成为农村的“癌症”。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中，农民集体的所有土地大量流失，不仅出现失地户，而土地“农转非”的收益甚微。自1999年至2017年，土地出让金高达34万亿元，最高的2014年为4.2万亿元，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农民所得无几，这是对农民土地财产的又一次严重剥夺，也成为产生村霸与“小官巨腐”的制度温床。必须指出，农民集体所有的财产包括资源性资产（土地、草地、林地、水域）、经营性资产（乡村企业）以及非经营性资产（公益性）的数量是巨大的，把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资本变股金，农民很快就富裕起来，脱贫问题也能迎刃而解。重庆市2015年将集体所有土地（包括承包地、宅基地、建设用地）实行产权价值化的“地票”制度，不仅盘活了土地的有效利用，而成为参与土地交易红利的分配，并与市民享受同等待遇。至2015年的四年来，“地票”交易15.2万亩，每亩售价20万元，总共收入306亿元，其中85%的纯收益按股分给农民，15%留作集体经济组织，在土地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的是市场，而不是政府。不仅促进了城市化与经济双位数增长，降低了城市化的成本，壮大了集体经济，维护了社会的安定。这个创造是土地集体所有产权股份化的发展，值得重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先在 29 个县试验土地股份合作改革，接着又在 300 个县试点，50 个地市、3 个省（自治区）推行，总计有 1000 个县在推进。这会大大丰富社会主义公有制产权理论。社会主义公有制有两种：一种是全民所有制，即国有制；另一种劳动人民集体所有制。在苏联农业中，国营农场占耕地的 50%，集体农庄占 50%。在中国，国营农场只占 4%，而集体所有占 96%。从 1956 年高级社开始至今，坚持农民缺位的集体所有。所谓集体所有经济是指农民共同所有的财产，主体是农民，但长期以来，这一主体是虚化的。中央提出集体所有不能虚置，通过发展土地股份合作社和社区股份合作社落实到户，使农民获得财产权，成为有产者，增加财产性收入，也就是使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股权，农民变股东，农民既是集体经济组织中的成员，是劳动者，是社员，同时又是资产所有者，是股东，既有劳动收入，又有财产性收入，包括在推行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经营中，分享延长农业产业链增值的收益，成为具有双重身份命运共同体的成员。这种制度不仅能使农民在经济上受益，而且还能使农民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包括知情话语权，决策参与权，资产处置权，收益分配权，管理人员选择权，民主监督权，严格约束乡村干部的权力，在制度上防止“小官巨腐”的出现，这样的集体经济才会有活力。

三是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第一规律，价值规律是一个大学校，使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能够自觉运用价值规律，使之健康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不论是在实行计划经济或是实行市场经济中，都有顺应与违反正反两方面的实践经验，给人们以深刻教益。例如自 1978 年至 1984 年粮食大增产，6 年间由 3 亿吨上升为 4 亿吨，基数大而周期反而短了。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最核心的是收购的价格政策，即在定购提价 30% 的基础上超购的再加 50%，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特别是无定购基数的“三靠”穷队，收购的价格增加了 80%。但是，1985 年粮食大减产 590 亿斤，减幅为 6.9%，原因也是多方面的，而核心同样是价格政策，即改为“倒三七”价格，使种粮农民收入大幅下降，随后出现了连续数年徘徊的局面。之后，虽每年有些微调，如实行“三挂钩”（与预购定金、生产资料、播种面积）以及各种形式补贴的优惠政策，粮食总产有微小的回升，优惠力度与产量回升呈正相关的关系十分明显。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承认价值规律在消费领域中起调节作用，在生产领域只起影响作用。毛泽东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在生产领域由于存在两种所有制，国有企业的生产资料是靠计划调拨的，而集体企业是靠市场的，因此仍起调节作用。这反映出对价值规律作用的不同理解。

四是村民自治是农民的一大创举，开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先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这个创造来自于广西自治区柳州市宜山县三岔乡。上个世纪 80 年代初，人民公社解体，成立了乡镇政府，在村设村公所。但这个乡未建村公所，而成立了村民委员会与村民小组，实行四大民主（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此举引起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的高度重视，经调查核定后，于 1988 年颁布了《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草案）》，在全国试行。经过实践，于 1998 年正式颁布推行。

尽管在实践中还有这样或那样不尽人意的地方，而使全球最大群体的中国农民走向民主政治的道路是绝无先例的，具有极其深远的政治意义。有人指责农民是文盲，搞民主选举是无稽之谈，这是对中国农民的歧视。早在苏区实行土地改革选举农民协会主席中，农民用点豆子的办法产生出自己拥护的人选。四川省南充市遂宁县步云乡在普及村民自治的基础上，试行由全乡农民直接选举乡长，一位老妇女先后于 101 岁和 104 岁，两次分别由儿子与孙子背着去投神圣的一票。由于不符合乡镇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乡镇长的法律，他

们采取了“双票制”的办法，先由乡民选举（相当于预选），然后再由人代会选举产生。由此看出，农民当家作主的民主诉求是多么强烈，在他们内心中，都有一杆衡量是非的天秤，是无法取代的。历史是劳动人民创造的，不是一句空话，中国农民的智慧是不能低估的。在全国 40 多万个行政村中，在高度自治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年经济收入超过百亿元的村有数十个，其中最高的是陕西省宝鸡市东岭村。据报道，在美丽宝鸡的中心地带，坐落着一个经济发达、和谐文明、富有活力的村庄——东岭村。东岭村共 210 户、812 人。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村党支部书记李黑记同志的带领下，以村办企业东岭集团为依托和支撑，按照“村企合一，以企带村，共同发展”的思路，务实苦干，开拓创新，走出了一条“小加工起步、大流通发展、工业化扩张、资本化裂变”的跨越发展之路。2017 年村民户均资产超过 300 万元，人均纯收入达到 10 万元，人均住房面积超过 80 平方米，先后荣获“全国文明村”“中国十佳小康村”“中国幸福村”等百余项殊荣。东岭集团是陕西省最大的民营企业，成为多种产业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截止 2017 年，总资产 382 亿元，总收入 1300 亿元，员工 1.8 万名，下辖 100 多个成员企业（公司），分布在西安、兰州、西宁、银川、包头、乌鲁木齐、成都、重庆、长沙、郑州、贵阳、昆明、武汉、南昌、合肥等 30 多个中心城市，为“中国企业 500 强”与“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之一。

五是社会主义既要提高效率，更要强调实现公平，把两者统一起来，这与资本主义只讲效率而忽视公平有本质区别。但是在社会主义实践中，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实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中，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一方面是经济高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资源与环境为代价，包括农业上毁林开荒、毁草开荒等。粮食“十二连增”是以过量使用化肥与农药造成面源污染与土壤重金属污染为代价的。我们以世界 9% 的耕地，使用了 30%—40% 的化肥，难以为继，是不可持续的。近些年来，大力推行生态农业、绿色农业、低碳农业、循环农业、可持续发展农业等，是正在对此方针的矫正。在经济规律与自然规律发生矛盾时，前者应服从于后者。另一方面造成严重社会不公，贫富悬殊越来越大，少数富豪占有了大量社会财富。特别是在社会上出现的三个拜物教：一是 GDP 拜物教，二是西方物质文明的拜物教，三是金钱的拜物教。还有把市场经济追求利润原则扩展到文化、教育、医疗等非经济领域，这种“泛市场化”造成的恶果十分严重，这是巨大的精神污染，也就是在实现物质文明中，损害了精神文明，特别令人忧虑的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华民族文化，形成严重的断层，这种局面要努力改变。号称“天下第一村”的江苏省华西村，采取股份制形式发展经济，多年来经营收入达 500 亿元左右，村民年均收入 10 万元左右。这里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以体力劳动已基本消灭。华西不仅本村村民富裕起来，还带动周围 18 个村共同富裕起来，92% 的员工来自五湖四海，2017 年上交税金由 1978 年的 28 万元上升为 13.5 亿元。他们为解决上述三个拜物教问题提供了样板。

值得关注的则是由第二国际所属的社会民主党执政的国家，十分重视社会公平，贫富差距较小，社会比较稳定，应以科学的态度实事求是加以重新评价。我们应该坚持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原则。浙江省是个土地少、人口多，人均土地很小的省，在农村实施股份合作制，激发了活力，有力促进经济、社会与生态协调发展，增加了农民收入，缩小了城乡差别，已于 2015 年消除了由县——乡——村——组——户五级的绝对贫困，标准为人均不低于 4600 元，走在全国最前列。

六是农业由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结合起来的经济体，延长农业生产链，实行生产——加工——销售

一体化，才能提高农业的附加值与整体效益。中国幅员辽阔，资源丰富，从寒温带到赤道热带，是世界最大的生物基因库。长时期以来，由于天灾人祸与战争等原因，资源受到及其严重的破坏，农村环境严重恶化。由于实行以粮为纲的方针，产业结构十分单一，农民收入低下，贫困人口甚多。改革开放以前有两个 80%，一是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80%；在农村人口中，贫困人口占 80%。改革开放以来，首先创造了土地的家庭经营，获得生产经营自主权，但是由于按户均分（好次地与远近地搭配），造成细碎化、分散化“超小型农户”经济，经营规模小，劳动生产率极低，在提出土地经营权流转以后，由于农民惜地思想严重，有后顾之忧，不愿转包，转包率低，到目前为止，转包出去的承包地占 36%，这是制约农业现代化与增加农民收入的严重瓶颈。为此，需要加速调整农村产业结构，推进农村工业化与城镇化，就地转移农业劳动力，为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创造条件。早在人民公社时期，为避免公社与生产大队平调生产队与农民的财产，提倡并支持为农业服务的社队企业。改革开放以后，由于人民公社解体，易名为乡镇企业，被誉之为“异军突起”，走出一条新型工业化与城镇化道路。到目前为止，乡镇企业已吸纳 1 亿农业劳动力，延长了农业生产链，提高农业的附加值。农产品加工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由 1978 年的 0.8:1 提高到 2017 年的 2.4:1。农村经济占全国 GDP 的近一半。1991—1995 年全国 GDP 平均增长 11.8% 双位数，其中城市贡献率为 3.63，占 31.06%；农村贡献率为 8.18，占 68.94%，如除去农村发展则是低速。有些城市工商企业下乡参加新农村建设，形成企业+股份合作社+农户的新型经营模式。河北省邢台市金沙河乡由一家现代化面粉厂全额收购了 2 万亩优质小麦加工，由 7 名职业农民种植小麦，每月工资 7000 元，实现了规模化与现代化。合作社从经营收入中拿出一部分资金给支部与村委会，每人每亩 50 元津贴，村民转移土地每亩 1000 元。全国目前进城打工的农民工有 2.8 亿，接近美国人口，有一批艰苦创业成为大企业家的已有 400 万，逐步在搞第二次创业。

近年来，各地、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的农村，利用当地独特的自然景观与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兴办多种多样的“农家乐”，发展旅游、观光、休闲、度假等第三产业，发挥了农业的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多种功能，收到显著成效。2016 年全国在农村旅游的达 22 亿人次，经营收入 5800 亿元，从业人员 800 万人，人均劳动生产率 7 万多元。2016 年全国第三产业已经超过第二产业，而农村的第三产业落后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潜力巨大，前景广阔。

总之，中国农民具有巨大的创造力，在改革开放年代，出现了吴仁宝、鲁冠球、徐文荣等当代农民领袖，是农民这一最大群体的杰出代表。在他们的血液里，流淌着中华民族中以儒家与道家的哲学思想为基础的文化基因，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动力源泉，只要给他们一个宽松的环境，就会创造出新的人间奇迹。回顾历史，使我们感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十分重要。毛泽东依靠农民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夺取了革命的胜利，产生了毛泽东思想，这是第一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在进入改革开放阶段，邓小平以农村为突破口，抛弃了“两个凡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中，取得了重大成就，产生了邓小平理论，这是第二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胜利。这次的中国化正在进行中，力求形成具有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完整体系，从生产关系到生产力，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物质文明到精神文明，以国歌与国际歌的歌词为宗旨，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第三次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中增添新的实践经验，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为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体改法规司长，高级经济师，2018 年 8 月 20 日）

依靠学习和实践走向未来

——再谈我们读书组的读书

丁玉华

2015年，农业部离退休干部局组织开展了“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有奖征文活动，我撰写的《依靠学习和实践开创未来——谈谈咱们的读书会》文章，刊登在《农业部老同志为党的事业增添正能量优秀征文选编》一书上，总结了农业部离退休干部局老干部读书会几年的工作和读书经验。时间真快，几年过去了，读书组的学习又有新的发展，现写了《再谈我们读书组的读书》一文，作为纪念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贺礼。

和平里活动站读书组，2018年全组16人，每月组织一次集体交流活动，十几年来从未间断过，大部成员都能按时参加，每次发言都非常热烈。今年学习的重点是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两会”内容、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上合组织峰会、中非合作论坛等国内外重大议题，特别是对读什么书和如何读书课题多次展开热烈讨论。

关于读书，大家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和比喻。有人说，读书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态度，一种精神追求，一种生活方式。有人说，读书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风度，人适当有些书卷气，是可爱的。有人说，读书养心，它改变的是你面对世界的态度。这些都从一种侧面传达出为什么要读书的思想。人们阅读的目的虽各种各样，但总体上说，无非是为了树信仰、求真知、促实践、养心智、达情意。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依靠学习走向未来”，这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十八部分第二节的标题。书中写道：“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引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407页）

书上还说：本领不是天生的，是通过学习和实践来获得的。当今时代，知识更新周期大大缩短，各种新知识、新情况、新事物层出不穷。有人研究过，18世纪以前，知识更新速度为90年左右翻一番；20世纪90年代以来，知识更新加速到3至5年翻一番。近50年来，人类社会创造的知识比过去3000年的总和还要多。还有人说，在农耕时代，一个人读几年书，就可以用一辈子；在工业经济时代，一个人读十几年书，才够用一辈子；到了知识经济时代，一个人必须学习一辈子，才能跟上时代前进的脚步。如果我们不努力提高各方面的知识素养，不自觉学习各种科学文化知识，不主动加快知识更新、优化知识结构、拓宽眼界和视野，那就难以增强本领，也就没有办法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因此，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加强学习的紧迫感。

正是从这样的战略高度出发，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任务。把学习型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学习是前提，学习好才能服务好，学习好才有可能进行创新。（引自习

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 403 页）

当今世界正处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深入发展，当代中国发展变化也很快，新情况新问题新事物层出不穷。要认识好、解决好这些问题，唯一的途径就是增强我们的本领。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为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进。

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

今年是毛泽东同志诞辰 125 周年，他离开这个世界已经 42 年。对他的功过已有评说，详见《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一卷第 25 页“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 120 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但对作为文章家的毛泽东还研究不够，这笔财富有待挖掘。2018 年 9 月 12 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大家毛泽东》。活动站为读书组复印下来，进行学习并展开热烈讨论。

中国是个文章的国度，青史不绝，佳作迭出。向来说文章有汉司马、唐韩柳、宋东坡、清康梁，群峰逶迤，比肩竞秀。毛泽东算一个，是历史群山中一座巍峨的高峰。

在中外历史上，像毛泽东那样酷爱读书，并且读有所得，得而能用，用而生巧的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非常罕见。毛泽东的学用之道，大体即在这读——得——用——巧之间。在阅读中，同古今中外的人、事、理进行“对话和交流”，他觉得是很愉快的体验，能够实现求知的心理期待，得到智慧愉悦和审美满足，然后是如鱼得水，运用自如。

毛泽东喜欢读什么书？毛泽东一生究竟读了多少书，读了哪些书，我们可以从他的藏书中，从他的批注中，从他的著述和谈话中知其大概。毛泽东去世后，在中南海住处留存的藏书，种类繁多，规模宏大，达一万余种，近十万册，一些书中留下了他的批注和圈画。毛泽东读而未藏，以及读过藏过但后来丢失的书籍，更不知几何。（引自陈晋《学用之道》）

毛泽东博览群书，不只表现为数量大，领域多，他还注重阅读一些在特定环境中流传不广，作为革命家和政治家很少去关注的书。毛泽东的阅读不仅广博，而且专深。

毛泽东的阅读虽广博和专深，但他的阅读重点排在前三位的，是马列、哲学和历史。

关于读马列著作，他希望通过阅读马列著作，精通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进而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有理论和实践上的新创造。

毛泽东文章的特点首在磅礴凌厉的气势。文章之势，是文章之外的功夫，是作者的胸中之气、行事之势。势是不能强造假为的，得有大思想、真见识。古今文章家大致可分为两种，一是纯文人，一是政治家。纯文人之文情胜于理，政治家之文理胜于情。理者，思想也。写文章，说到底是在拼思想。

只有政治家才能总结社会规律，借历史交替，群雄逐鹿之势，纳雷霆于文字，排山倒海，摧枯拉朽，宣扬自己的政见。毛泽东的文章就属于这一类。这种文字不是用笔写出来的，而是作者全身心社会实践的结晶。劳其心、履其险、砺其志、成其业，然后发而成文。文章只是他事业的一部分，我们可以随便举出一些段落来看他文章的气势。

1938 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内撰写《论持久战》，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再看他在 1949 年第一届政协会议上的致词：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让那些内外反动派在我们面前发抖罢，让他们去说我们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罢，中国人民的不屈不挠的努力必将稳步地达到自己的目的。

这是一个胜利者的口吻，时代巨人的口吻。解放后美国搞核讹诈，他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古今哪一个文章家有这样的气势。

毛泽东说，学习的目的全在于运用。他是着眼和立足于实践发展的理论家，习惯于把阅读和不断发展的实践联系起来进行理论思考。毛泽东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但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

在阅读和理论探索上，毛泽东常怀未竟之志。1961 年 12 月 5 日会见委内瑞拉外宾时，他说：“马列有很多书都要看，但其中有几卷特别值得看的，就是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是对于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就是说深入分析具体情况。”邓小平同志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2018 年 5 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编印出版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一书中说：“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就是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作贡献。”

看文章名家是怎样读书

由季羡林主编，2008 年出版的《百年美文》（1900-2000），第一辑出版五卷：哲思卷、读书卷、地域卷、生活卷、女性情感卷。季先生在《序言》中写道：“五四”新文学是中西文化碰撞的产物。“五四”以来的诸多文体中，散文堪称一枝独秀。留给我印象最深刻最鲜明的有鲁迅的沉郁雄浑、冰心的隽秀玲珑、朱自清的淳朴淡泊、沈从文的轻灵曼妙、丰子恺的厚垂平实、杨朔的镂金错彩，其余大家，也是各有千秋。这百年中的散文，特别是其中之美文，不可不读。

所谓美文，即指那些不仅诉诸读者之理智，且足以打动读者之心灵的篇章。美文的精髓在于“真情”二字，这二字也可以分开来讲：真，就是真实，不能像小说那样虚构幻造；情，就是要有抒情的成分，且感情真挚。

我阅读了《百年美文》“读书卷”的大部文章，并在小组里作了介绍。第一篇是蔡元培的《我的读书经验》，第二篇是鲁迅的《读书杂谈》，以下是胡适的《为什么读书》，朱自清的《买书》，郭沫若的《卖书》，老舍的《读书》，郁达夫的《人与书》，莫言的《童年读书》，贾平凹的《好读书》等等。

在《读书卷》“卷首语”中指出：读书，可谓自文字发明以来，人类最普遍、最重要的文化行为。其媒介，先是竹木布帛兽皮，后是纸张为王，今又继之以电子激光。套一俗语句式：古往今来，世界上只有两种人，读书者与不读书者。

读书的意义，就集体而言，是得以继承万千百年各种人类文明、经验的过程，是人类伟大智慧、精神的延伸；使后人深入更广阔的空间、更久远的时间；是形成或一群体共同价值观和精神家园的有效途径。就个体来说，阅读则是纯粹个人活动，读书者于此寻得人生快乐；读书使人获得更丰富的自我、更广阔的思想 and 精神自由，因而成为个人修养的内在需要；读书伴随一代代人心智的生长，成为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人因此一生与书结缘，永不放弃书的阅读。抚摩书页，嗅得书香，与古人、洋人、今人为友，乃何等美妙、独特的感受和品味。

冯友兰（1895—1900）：哲学家、教育家。他在《我的读书经验》上说：我今年八十七岁了，从七岁上学起就读书，一直读了八十年，其间基本上没有间断，不能说对于读书没有一点经验。我所读的书，大概都是文、史、哲方面的，特别是哲。我的经验总结起来有四点：①精其选，②解其言，③知其意，④明其理。

先说第一点。古今中外，积累起来的书真是多极了，真是浩如烟海。但是，书虽多，有永久价值的还是少数。可以把书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要精读的，第二类是可以泛读的，第三类是只供翻阅的。所谓精读，是说要认真地读，扎扎实实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读。所谓泛读，是说可以粗枝大叶地读。只要知道它大概说的是什么就行了。所谓翻阅，是说不要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不要一句话一句话地读，也不要一页一页地读。就像看报纸一样，随手一翻，看看大字标题，觉得有兴趣的地方就大略看看，没有兴趣的地方就随手翻过。会读书的人能把死书读活，不会读书的人能把活书读死。死读书的人就是书呆子。把死书读活，就能把书为我所用，把活书读死，就是把我为书所用。能够用书而不为书新用，读书就算读到家了。

胡适（1891—1962）：学者、教育家。在他《为什么读书》讲演中说：从前有一位大哲学家做了一篇《读书乐》，说到读书的好处，他说：“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这意思就是说，读了书可以做大官，获厚禄，可以不至于住茅草房子，可以娶得年轻的漂亮太太（台下哄笑）。诸位听了笑起来，足见诸位对于这位哲学家所说的话不十分满意，现在我就讲所以要读书的别的原因。

为什么要读书？有三点可以讲：第一，因为书是过去已经知道的知识学问和经验的一种记录，我们读书便是要接受这人类的遗产，以此为基础，可以继续发扬光大，更在这个基础上，建立更高更深更伟大的知识。第二点稍复杂，读书是为了要多读书，多读书更可以读书。人们最大的毛病就在于怕读书，怕读难书。越难读的书我们越要征服它们，把它们作为我们的奴隶或向导，这才是我们的“读书乐”。第三点，读书可以帮助解决困难，应付环境，供给思想材料。

老舍（1899—1966）在《读书》一文中说：怎样读书，是个自决的问题；我说我的，没勉强谁跟我学。第一，我读书没系统。借着什么，买着什么，遇着什么，就读什么。不懂的放下，使我糊涂的放下，没趣味的放下，不客气。我不能叫书管着我。

第二，读得很快，而不记住。书要都叫我记住，还要书干吗？对我，最讨厌的发问是：“那个典故是哪儿的呢？”“那句话是怎么来着？”我永不回答这样的考问，即使我记得。我又不是印刷机器养的，管你这一套！

第三，读完一本书，没有批评，谁也不告诉。

第四，我不读自己的书，不愿谈自己的书。“儿子是自己的好”，我不晓得，因为自己还没有儿子。有个小女儿，女儿能不能代表儿子，就不得而知。“老婆是别人的好”，我也不敢加以拥护，特别是在家里。但是我准知道，书是别人的好，别人的书未必都好，可是至少给我一点我不知道的东西。

第五，哼，算了吧。

鲁迅在《读书杂谈》上说：关于批评的事。中国的批评文字，我总是越看越糊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有一个比喻。他们说：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子驮着货物去出卖，货卖去了，孩子骑驴回来，老翁跟着走。但路人责备他了，说是不晓事，叫老年人徒步。他们便换了一个地位，而旁人又说老人忍心；老人忙将孩子抱到鞍辔上，后来看见的人却说他们残酷；于是都下来，走了不久，可又有人笑他们了，说他们是呆子，空着现成的驴子却不骑。于是老人对孩子叹息道，我们只剩下一个办法了，是我们两人抬着驴子走。无论读，无论做，倘若旁证博访，结果是往往会弄到抬驴子走的。

余秋雨说：在信息爆炸的现代，“开卷有益”的说法十分危险。事实上，当你占有了一本书，这本书也占有了你。你占有书，是一种不知内容等级的冒险；书占有你，却是实实在在消耗了你不可重复的一个生命过程。这种消耗，是一种表面温柔实则残忍的生命剥夺。

因此，我提出几点阅读建议。一是要读第一流的好书；二是要读得少而精，不可贪多；三是要选与自己有缘分书，也就是在第一流的好书中寻找自己能读得下去的书。古今中外第一流的好书不少，其中只有极少数与你的生命亲密对应。这样的书，一旦见到如遇故人，不忍释卷，证明你与世界上的某位重要作家有“同构关系”，只有找到这种关系，你也就找到了逼近伟大的绳索。因此，找书其实是找自己。

有的学者提出，读书有两个门径：“修身不外读经，经邦济世不外读史。”做人做事都要读经，因为经学讲究“修身”，主要告诉你做人做事的道理。经邦济世则要读史，史书告诉你操作的案例。光学习道理是不够的，道理是抽象的，有严格的限定条件，脱离了具体环境和约束条件，各种道理往往是互相矛盾的。例如，人们常说，“宁可玉碎，不可瓦全”；可俗话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是“狭路相逢勇者胜”，还是“退一步海阔天空”？应该“宜将剩勇追穷寇”，还是“得饶人处且饶人”？这些看似矛盾的俗语，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衡量标准在里面，时移则事异，事异则备变。所以，读经之外，还应读史，史书能提供具体的操作案例，明白道理的边界在哪里。

读书组的活动越来越兴旺

和平里活动站读书组的活动越来越兴旺，一是由于活动站和党总支重视，二是有一个好组长。从2001年4月读书组成立至2017年年初，应曰琰一直任组长。他曾是农业出版社、农牧渔业报总编、副社长、部办公厅副主任（正局），多年主管农业系统编辑、出版工作，经验丰富、知识面广，人缘又好，这样的读书组组长实在难得。现任组长王怀英（局党委常委）、副组长刘忠（副书记），认真负责，朝气蓬勃。原书记郭士勤就是读书组成员，现任书记黄宝华也曾深入读书组参加讨论。抗战老兵张文庆拄着拐棍来参加活动，当场背诵王羲之的《兰亭集序》全文，博得全组掌声。原规定自由参加活动，不到可以不请假，宫玉祥、阙爱华夫妇去日本探亲，在读书活动那天，接到他们从日本打来电话请假，并介绍了当地的情况，大家听了都非常高兴。

读书与参观调研相结合。近两年来，活动站组织参观了长城桑干酒庄、抗日战争纪念馆、北京市农村改革典型大兴窦店，参加农村改革建言献策报告会和农业农村部系统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文艺汇演等。

长城桑干酒庄是国家级的葡萄酒厂，位于美丽的桑干河畔，出产国家级的特定葡萄酒，已作为“国宴”、“国礼”招待贵宾和馈赠国际友人。我们参观了古今中外葡萄酒的展览，品尝了美酒，并到葡萄园进行采摘。此地是全国著名的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地区。联合国粮农组织启动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我国已列入农业文化遗产名录有11个项目，位居全球之首。11个项目中就有河北宣化城市传统葡萄园。

读书与撰写论文和著书立说相结合。读书组参加部里举办的征文活动，每次都有十几篇应选。每年有七、八篇文章刊登在报刊和内部刊物上。赖瑞华同志2017年编著的《中国闺阁诗词荟萃》一书，40万字，是一部辑录我国历代闺阁女性诗歌集。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新华书店在全国发行。在活动站举行了赠书仪式，大家都很高兴的阅读自己人写的书。近几年来，赖瑞华同志为歌颂党的十八、十九大和改革开放40周年，撰写大量热情奔放的诗词，编辑成书，书名为《拾穗集》，即将出版。

读书组已成为活动站和党支部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有的说，读书组起到了党支部学习中心组的作用。

18 年来，读书组按照党中央“老有所养，老有所教、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的精神，坚持读书活动与支部学习、思想引导、丰富生活相融合，做到政治性、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相统一，不断满足离退休干部精神文化生活需要，为构建和谐社会、和谐部委做出了贡献，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作者：农业农村部离退休干部局老干部，高级经济师，2018 年 9 月 30 日）

北大荒精神的锻造者与践行者

——纪念 10 万复转官兵开发建设北大荒 60 周年

胡中禄

在黑龙江垦区开发建设 71 年的征程中，1958 年 10 万复转官兵进军北大荒掀起大规模开发建设高潮是其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从此，北大荒农垦事业进入了决战决胜的关键时期。60 年来，广大复转官兵不仅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创造了丰硕的精神成果——北大荒文化和北大荒精神，成为北大荒人永恒的精神财富。

一、10 万复转官兵开发北大荒决策的作出

1945 年，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党中央高瞻远瞩、喜审时度势，发出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号召。1947 年，中共中央东北局在财经工作会议上传达了党中央的指示：为迎接全国解放，组织亿万农民走集体化、机械化生产道路，要在北满创办“粮食工厂”，主要任务是培养干部、积累经验、创造典型、示范农民，于是一批批荣复军人陆续来到北大荒，创建了宁安、赵光等第一批国营机械农场，黑龙江垦区也就由此诞生。

1949 年 12 月，新中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主席就发布了“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后经历“三年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黑龙江垦区农场数由 1949 年的 15 个增加到 1955 年的 54 个。1956 年，党中央为加强对全国农垦事业的领导，决定成立农垦部，并任命王震同志为第一任部长，那时的王震同志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委员会委员、铁道兵司令员，又给他加上农垦的担子，足见党中央对农垦事业的重视和对王震同志的信任。

1955 年 8 月，经王震同志亲手多次修改的一份《关于开发北大荒问题》的报告，提交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中央领导对此十分重视，并做了批示；1956 年，王震同志亲自率领 1.7 万名铁道复转官兵开赴北大荒，揭开了军垦的序幕；1958 年 1 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发出《动员 10 万转业官兵参加生产建设》的指示；3 月党中央在成都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发展军垦农场的意见》；4 月 10 万复转官兵奔赴北大荒，大规模建场扩场，在新中国垦荒史上，形成了 10 万大军鏖战北大荒的军垦高潮。这期间，首都北京及其他一些大城市也掀起了支援北大荒建设的热潮。毛泽东主席非常支持北大荒的开发建设，他亲自决定把中央警卫团文工队裁员三分之二交给王震同志，下放到北大荒去参加开发建设。这时垦区农场数已由 1955 年的 54 个增加到 103 个，耕地面积达 1750 万亩，职工达 31.7 万人，黑龙江垦区从此进入大发展时期。

二、北大荒文化的形成与发展

文化是一系列风俗、习惯、规范、准则及人类能力发展的成果，如艺术、科学等的总和。它起着规范、导向、传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作用。

黑龙江垦区是一个文化底蕴深厚的经济社会区域，自 20 世纪 40 年代末以来，在黑龙江省的广袤荒原上（此处没有用一些人常用的“亘古”来形容这片荒原，因为经考古证明，这块黑土地上也曾有过相当发达的文明）聚集了一支来自全国各地的垦荒队伍，这就是第一代北大荒人。他们当中有荣誉军人、复员转业官兵、大中专毕业生、志愿垦荒队员、支边青年、知识青年、下放锻炼的作家、文艺工作者等。他们在历代屯垦者未能征服的黑土地上，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战胜了难以想象的恶劣环境，在这片神奇而又桀骜不驯的土地上，终于建起了一个现代化的国有农场群，成为国家重要的商品粮基地，把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

第一代北大荒人在战天斗地，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也改造着自己的主观世界，形成了北大荒文化，也培育和锻造了北大荒精神。北大荒精神是北大荒文化的核心，是北大荒文化的灵魂。

（一）军旅文化的洪流

如同北大荒农垦事业的开发一样，北大荒文化事业的开拓与发展，10 万复转官兵及其后来者起了引领与主导的作用。20 世纪 50 年代末，全国共有 14 万复转官兵先后奔赴北大荒，其中有一批是文艺工作者和爱好者。他们白天在荒原上挥镐拉犁，夜里趴在马架子里挑灯挥笔，以饱满的激情创作出一大批具有鲜明特色的优秀作品，如转业官兵中林予的长篇小说《雁飞塞北》，范国栋的话剧和电影《北大荒人》等，讴歌了第一代拓荒者不畏艰辛、艰苦创业的英雄业绩，成功地塑造了一批既具有时代和地域特色，又具有北大荒人气质与性格特征的人物形象。《北大荒文艺》《北大仓文艺》和《北大荒画报》的创办及北大荒电视摄制组的建立，加快了北大荒文化的发展与初步繁荣。尤其是北大荒版画，在晁楣、张作良等人的辛勤探索和努力创作下，异军突起，为国人瞩目，并冲出了亚洲，走向世界。北大荒文工团创建于 1959 年，近半个世纪以来，创作排演了《北大荒人》《于无声处》《泪血樱花》《阿混新传》《少帅传奇》等大型话剧 38 部，曾 6 次到北京演出，足迹遍布全国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其中话剧《北大荒人》在北京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连续演出，后又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彩色故事片在全国上映。

（二）“流人”文化的加盟

1958 年 3 月，除军队中的 1500 多名“右派”悉数来到北大荒外，国务院各部、委、局的 600 多名“右派”，其中有丁玲、艾青、聂绀弩、丁聪、吴祖光、李景波、尹瘦石等一大批文艺界名人也来到此地（这批“右派”是王震将军亲自要来的），为初创时期的北大荒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各种艺术门类和样式日益丰富起来，他们在饱受精神摧残的同时，仍创作出一批有影响的作品。丁玲，曾任延安《解放日报》主编、《文艺报》主编，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1957 年被打为“右派”，1958 年 7 月与丈夫陈明下放到黑龙江省汤原农场劳动，1964 年移居黑龙江省宝泉岭农场，在黑龙江省期间除接受批判、改造外，还创作了小说《杜晚香》、散文《人民哺育了我》《初到密山》和《牛棚小品》；艾青，现代著名诗人，新中国成立后任《人民文学》主编，中国作协副主席，1957 年被打为“右派”，1958 年 5 月由北京下放到黑龙江省八五二农场林业分场任副场长，在黑龙江省期间著有以“老头店”为主题的长诗《蛤蟆通河畔的朝阳》《踏破沃野千里雪》等；吴祖光，我国著名剧作家，也来到黑龙江省八五三农场改造，在此期间，他与伙伴王正共同创作了话剧《卫星城》《光明曲》，还为牡丹江农垦文工团写了京剧剧本《夜闯完达山》，儿童歌剧《除四害》等；

聂绀弩，我国著名作家、评论家、诗人，1958年被打为“右派”，下放北大荒劳动改造，后调至牡丹江农垦局主办的北大荒文艺杂志社任编辑，在北大荒的4年间，写有七言律诗50余首，辑成《北荒草》；丁聪，《人民画报》副总编，1957年被打为“右派”，来到黑龙江省八五〇农场劳动改造，在北大荒文学杂志社做美术编辑；李铮，原中国电影乐团副团长，曾指挥艺术片《黄河大合唱》序曲，1958年被打为“右派”来到北大荒，在黑龙江省八五三农场二分场六队劳动改造，后调到总场文工队、二分场宣传队，演奏二胡及琵琶；汪立三，上海音乐学院毕业，被打为“右派”，下放到合江农垦局文工团，后调到省里从事音乐艺术工作，钢琴组曲《东山魁夷画意》曾获全国一等奖，具有国际影响力，平反后任哈尔滨艺术学院院长、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黑龙江省音协主席、黑龙江省文联副主席；钱正钧，一级作曲家，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1958年被打为“右派”来到垦区，曾创作《北方风情素描》交响曲及许多歌曲，并出版专集《琴弦》，现为华南师大教授、中国音协会员、全国高等师范作曲学会理事；罗平，原中国电影乐团首席小号，1958年被打为“右派”，到黑龙江省八五三农场二分场六队，后调到总场文工队，演奏小号、扬琴，并在农场的“小行星艺校”授专业课，培养了不少人才。

古人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在北大荒这个并不太大的山头上，一时聚集了如此众多的文艺高手，这种文化现象在全国或全世界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

（三）知青文化的兴起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随着54万城市知青的到来，一场波澜壮阔的知青文化横空出世。知青文化是以屯垦戍边为特色与城市文化交融的产物，孕育出一批才华横溢的知青作家，如张抗抗、梁晓声、李云龙、肖复兴、贾宏图、蒋巍、陆星儿、陈宜明等，他们以敏锐的视角对人生、社会进行全新感悟，创作出大量反映北大荒知青生活的文艺作品，轰动一时，其代表作品有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张抗抗的《隐形伴侣》等。张抗抗先以《夏》《爱的权利》《淡淡的晨雾》连续获得全国中短篇小说奖，后又以长篇小说《赤彤丹朱》《情爱画廊》等影响中国文坛，并以散文获得鲁迅文学奖。从垦区知青中走出去的曲艺名家姜昆、赵炎、师胜杰和围棋名家聂卫平等，更是在各自领域叱咤风云，影响深远。

三、北大荒精神的培育与锻造

北大荒精神是北大荒文化的集中反映，是北荒文化的核心与灵魂，是北大荒人共同一致、彼此共鸣的内心态度、意志状态、思想境界和理想追求。

（一）北大荒精神的含义

所谓北大荒精神，是以10万复转官兵为代表的百万北大荒人，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品德和红军、八路军与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在开发建设北大荒的宏伟事业中战胜各种艰难险阻，历经磨砺而共同形成的内心态度、意志状态、思想境界和理想追求。其主要内涵可表述为：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勇于开拓的创新锐气、顾全大局的坦荡胸怀、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

（二）北大荒精神的形成

北大荒精神在垦区初创时期，既没有人鲜明地提出，更没有准确完整地论述。但从1947年6月开始，以李在人、周光亚等为代表的解放军战士踏上这片荒原时，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核心思想就已得到了确认，并成为激励人们勇往直前的精神动力。随后大批荣军战士来到北大荒，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开荒建场，在全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他们以一颗红心和残缺的肢体，对艰苦奋斗、顾全大局和无私奉献的精神做出了最好的诠释。

1958年，在王震将军统率下，10万复转官兵开北大荒，掀起大规模的开荒建场高潮，这是北大荒精神形成的最重要时期。王震将军的倡导，复转官兵对南泥湾精神的继承与发扬，战天斗地的艰苦，使北大荒精神逐步成形。因此，10万复转官兵正成为北大荒精神的锻造者和践行者。

10万复转官兵开赴北大荒之后，近6万山东支边青年和移民，高举垦荒的旗帜来到北大荒。他们大部分是工农子弟，团员、党员较多，素质较好，身上集中体现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吃苦耐劳、艰苦奋斗的传统美德。他们和复转官兵、农场老职工一起为垦区的开发建设作出重要贡献，成为一支强劲的生力军，也为北大荒精神的形成添加了更多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元素。

1963—1976年，先后有54万城市知识青年加入到北大荒人的行列，他们带来了城市文明和文化、教育与科技的普及，是历史上一次极为罕见的大规模文化移植运动。在第一代北大荒创业者的言传身教下，在北大荒艰苦条件的磨砺下，他们迅速成长，成为北大荒精神的继承人与弘扬者。

北大荒精神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领导人的倡导与率先垂范

1958年3月，毛泽东主席对中央警卫团文工队自愿去北大荒参加开发建设的李艾等同志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吃点苦是好事。你们离开北京到北大荒去，肯定会遇到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难，这一点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不管在什么困难的条件下，都要乐观，要挺得住”。领袖的教诲变为精神的力量，使这批年轻人经受了艰难困苦的考验，并受用终生。

1958年4月13日，密山车站广场上举行了欢迎人民解放军复转官兵进军北大荒的万人大会。大会主席台两侧书写着两条醒目的标语：“密虎宝饶千里沃野变良田；完达山下英雄建国立家园”，横批是“艰苦创业”。这是王震将军亲自拟写的，大大激励了复转官兵们的豪情壮志，王震将军对大会的复转官兵们说：“欢迎同志们到北大荒来！”，会场上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王震将军鼓励复转官兵们吃苦耐劳，发扬解放军的光荣传统，一定能把北大荒建设好。

在艰苦奋斗方面，我国农垦事业的奠基人与直接指挥者王震将军，不仅亲自倡导，而且以身作则、身体力行，在北大荒留下了许多难忘的故事。正是有以王震将军为代表的各级领导的率先垂范与倡导培育，艰苦奋斗的北大荒精神才蔚然成风。

1958年5月1日，王震将军来到云山水库工地，他穿着一套褪了色的军装，脚下是一双解放鞋，很轻松地加入了抬土的人流中。他来到一位年轻军官跟前，拿起抬杠要跟他搭肩抬土筐，这位军官一时没认清是王震将军，但总觉得这位同志年纪大了，满筐的土压上肩头，说不定会伤到腰，在起肩时，稍稍把绳套往后移了移，这个“小动作”被将军发现了，立即笑着说：“我们可得平均待遇呀！”说着把绳套往前拉了回来。当将军背过身子起肩时，绳套还是往后移了几寸。一趟、两趟……接连抬了几趟，年轻军官才认出搭肩的是王震将军，不管怎样也不让他再抬，一面擦汗，一面憨笑着说：“王部长，您该歇歇了！”将军哈哈大笑起来，并且大声说：“好小伙子，有你这个干劲，社会主义一定能快马加鞭”。这一天，王震将军就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在工地上同吃、同乐、同劳动。王震将军这种艰苦朴素的作风是自幼养成的，他喜欢吃野菜的习惯终生未能改变。

1957年3月，王震带领随行人员到八五二农场检查春耕生产，中午来到一队，直接进了伙房。炊事班长陈国正正在炒菜，一看王部长来了，连忙放下锅铲子，刚要敬礼，王部长却迎上来主动和他握手。过了一会，陈国正溜到一边请示队长：“是煮大米饭还是包饺子？”还没等队长表态，王震听见了，笑着说：“不要另做，

第一线的同志很辛苦，大米、白面要留给他们吃。咱们就吃家常便饭吧！”说着，他拿起勺子在锅里盛了一碗高粱米饭，边吃边说：“小豆高粱米饭真香，可惜炒土豆没放辣椒。”这时炊事员小李拿起几个鸡蛋打在碗里搅拌。王震问：“是不是给病号做的？”小李说：“不是，是给您炒的。”王震一听，一把抢过碗来，把鸡蛋全都倒在菜锅里，一边搅拌一边说道：“好了，大家都可以尝尝鲜了。”将军走后，炊事员们都感到很难过：部长这么大年纪了，一直胃口不好，从1956年6月到现在已来农场四趟了，每次来都和战士们吃同样的饭菜，有时还自己排队，真是让大家心中不忍。队长安慰大家说：“别难过了，只要我们把生产搞好，部长就比什么都高兴！”

这段时期，王震将军经常深入基层，同战士们一起烧荒播种、抬土筑坝、锄地拉犁、修路造房，与同志们一起摸爬滚打、并肩战斗、同甘共苦、身体力行，为北大荒精神做了最好的诠释与示范，如同无声的命令，在垦区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2）模范的引导和榜样的作用

开发北大荒是无比壮丽的事业，这里有指挥员的丰功，也有默默无闻战士的伟绩，北大荒汇聚了如此众多的功臣模范，在战争年代，他们出生入死，战功显赫；在北大荒，他们又谱写了新的英雄篇章。英雄模范的榜样作用，如入夜的细雨，滋润着北大荒人的心田，使北大荒精神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开花、结果，并长成参天大树。

在这个英雄群体中，有戎马一生的老红军，有与日寇浴血奋战的老八路，有为新中国而战的勇士，有抗美援朝的英雄，还有参加上甘岭战役的志愿军十五军四十五师1200名战士。其中有在上甘岭战役中坚持坑道斗争14个昼夜荣立二等功的左尚喜；有亲自指挥邱少云连攻占391高地的87团参谋长吴品庆；有特级英雄黄继光连的指导员郝信友；还有1945年参军，先后荣立5次大功，参加过1950年全国英模大会，被中央军委命名为全军一级战斗英雄的赵中华；有荣立一等功11次的战斗模范和练兵模范李国富；有被命名为华东一级战斗英雄，曾参加开国大典的王宪法；有在锦州战役立过大功、在朝鲜战场击落敌机4架、击伤3架而被命名为“对空射击英雄”的孙福祥；有在淮海战役中抱着炸药包勇炸黄伯韬兵团司令部的二级战斗英雄周惠忠；有当兵11年立功12次，在渡江战役中侦察有功荣获华东军区战斗英雄（电影《渡江侦察记》中的原型）王树功……他们不计个人名利，仍像当年唱着战歌英勇杀敌一样，唱着“一颗红心交给党，英雄解甲重上战场”的战歌，进军北大荒！

1958年，按中央统一部署，到黑龙江垦区的复转官兵共有81500人，包括5个预备师、2个预备医院和属志愿军后勤部的2个兽医院。其中排以上干部60000人，营以上干部1200人。以预六师为例，排以上干部就有1576人，其中师级干部4人，团级干部46人，营级干部82人，连级干部468人，排级干部976人，有老红军4人，抗日战争时期入伍的252人。全体复转官兵的政治素质良好，党团员占85%，还有一大批荣立战功的英雄模范，他们在平凡的开荒建场劳动中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以修建黑龙江省八五〇农场的云山水库为例，这是规模最大、动员人力最多的一次“大会战”。云山水库工地先后调集了6000多人，其中有4000多人是复转官兵，因为机械少，整个工地仅有7台推土机，2台铲运斗车和10辆汽车，大坝的土方工程几乎由人工抬土填筑，水库总容量为4750万立方米，计划2年完成，而实际却只用了6个月，共开挖土方74万多立方米，其中用土筐抬的土方就有63万立方米，这座用复转官兵们辛勤的汗水和毅力浇筑的工程，使八五〇农场在七虎林河流域的2100公顷土地年年免遭旱涝，岁岁确保丰收。

英雄们把青春和生命融入北大荒，他们把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带到北大荒，又薪火相传，铸就了北大荒精神。

（3）广大群众的认可

以复转官兵为核心的北大荒人，来自全国除台湾、西藏外的各个省市自治区，共 30 多个民族，这是一支有崇高革命信仰、有较高政治素质、思想觉悟和严明纪律的队伍。在当时物质条件极其艰苦的情况下，北大荒人凭着思想政治工作、铁的纪律和植根在每个拓荒者心中的北大荒精神，凝聚在一起，最终征服了荒原。

1963—1976 年，垦区共接收安置了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哈尔滨等大中城市知识青年 54 万人。大批城市知识青年进入北大荒，提高了垦区职工队伍的文化素质，增加了新生力量。各农场都充分发挥知识青年有文化、接受新事物快的长处，让他们担任一些专业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工作。

广大城市知青在老一代垦荒战士带领下，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北大荒精神，在艰苦的环境下，为开发建设北大荒，默默地奉献力量，培养成为一代新人。但自 1976 年开始，落实政策，大批城市知青陆续返城，到 1995 年末继续工作在垦区的城市知识青年已不到 3 万人。大多数知青返城后，在各条战线和岗位上成为骨干力量，为改革开放做出了很大成绩。他们把北大荒当作第二故乡，怀有深厚感情，常常组团回访，集资投资，提供信息，继续为北大荒的发展奉献力量。著名企业家李晓华，原是二师十七团（普阳农场）十七连的战士，当过炊事员，喂过猪，1975 年返回北京，后成为拥有亿万资产香港华达投资公司的董事长。他致富不忘国家、不忘大荒，为垦区希望工程捐赠 100 万元。在返城知青中有一大批脱颖而出的优秀人才，如“棋圣”聂卫平、著名作家梁晓声、陆星儿、张抗抗等，还有著名艺术家姜昆、赵炎等。1995 年统计，仅天津、上海各界骨干力量中就有 700 多人是从北大荒回去的知识青年。还有 600 多人成为国家各级党政机关司局级以上领导干部，如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姜大明、国家环保局局长解振华、上海市秘书长周禹鹏等。20 世纪 90 年代垦区的场、处级干部中，城市知青有 300 多人，各类专业技术岗位上的知青数量更多，他们已成为垦区的中坚力量。

垦区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领导班子建设和职工队伍建设。垦区百万职工群众在领导人的倡导示范与英雄模范的带动下、影响下，高度认可并继承和弘扬了北大荒开发建设中形成的艰苦奋斗、勇于开拓的拼搏精神，组织化的团队精神，顾全大局、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奋发有为、勇于开拓的时代精神，使北大荒精神成为北大荒人的灵魂与核心价值观。

（4）领导的总结、肯定与弘扬

1983 年 8 月 7 日，邓小平同志来到垦区友谊农场五分场视察，看望在这里奋斗了 30 多年的北大荒人，对北大荒人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精神给予了肯定。

1986 年 7 月 20 日，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在佳木斯市的省农场总局文化宫举行了隆重的大会，纪念复转军人开发建设北大荒 30 周年。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派人参加了会议。78 岁高龄的王震将军挥笔为大会题词：“艰苦奋斗，勇于开拓”，这是对北大荒人艰苦创业历史的充分肯定，也是对北大荒精神的高度概括。会上省委领导同志做了重要讲话，高度赞扬和明确肯定了北大荒精神，并把它概括为“艰苦奋斗、勇于开拓、顾全大局、无私奉献”。

这是北大荒精神第一次作为黑龙江垦区特有的精神，得到了科学的阐述。1990 年，黑龙江省委提出“工业学习大庆精神，农业学习北大荒精神”的口号，在全省引起巨大反响。1995 年省委进一步号召全省人民要

“学习大庆精神、学习铁人精神、学习北大荒精神”，使北大荒精神成为全省人民的宝贵财富，并为全社会所认可。

1995年5月29日，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在听取垦区的工作汇报后，做了重要讲话，指出：“北大荒不仅产生了丰硕的物质成果，而且产生了丰硕的精神文明成果……北大荒精神，是艰苦奋斗精神，无私奉献精神，是与延安时期的南泥湾精神一脉相承的。南泥湾精神和北大荒精神对全党全国人民的鼓舞非常之大，是宝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个北大荒人，应感到骄傲、感到自豪、感到光荣”。

由此，北大荒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宝库中的一部分，熠熠生辉，光照千秋。

四、传承弘扬北大荒精神，履行好农垦的历史使命

60年一甲子，当年的复转官兵大多是20—30岁的热血青年，如今已是80—90岁的耄耋老人。他们秉持“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崇高理念，其子孙即第二、第三代北大荒人，继承父辈光荣传统，已成为垦区各个领域的骨干。他们传承弘扬北大荒精神，在垦区开发建设中继续作出巨大的贡献。

经过70多年的开发建设，垦区已成为我国耕地规模最大、机械化程度最高、综合生产能力最强的国有农场群，初步形成了以水利化、机械化、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模式，并成为国家重要的现代农业示范基地。

2016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193.7亿元，产业结构逐步优化，一二三产业比例为43.5：20.7：35.8，粮食总产量达到411.9亿斤，连续5年稳定在400亿斤以上。

2017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227.3亿元，同比增长5.8%；垦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27153元，同比增长6.8%。

新世纪是黑龙江垦区改革发展快速推进的新时期。在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在省委省政府和农业部的直接领导与支持下，垦区职工群众弘北大荒精神，在适应新形势、新要求的情况下推进农垦改革发展，努力把垦区建设成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的国家队，建设成为中国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的示范区、农业对外合作排头兵、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垦区在这些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忠实地履行了垦区的历史使命。

今后，垦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农垦改革发展的意见》精神，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紧紧围绕全省“五大规划”和“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抓好“两头两尾”，做好“三篇大文章”。以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为核心，以推进垦区集团化、农场企业化改革为主线，着力完善垦区体制机制，着力推进结构调整，着力鼓励创新创业，着力保障改善民生。加大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力度，发挥优势，补齐短板，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不断提升垦区的内生动力、发展活力和整体竞争力。

依靠创新驱动，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推进资源资产整合、产业优化升级，建设现代农业的大基地、大企业、大产业，把垦区打造成国际化的特大型现代农业企业集团，努力形成农业领域的航母，争当农业现代化的排头兵，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作者：黑龙江省农垦总局政研室研究员）

欧洲生态文明建设的崭新途径

——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

王兴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庄贵阳和该院研究生院博士生薄凡的长篇文章《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生态文明建设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1〕}，令人耳目一新，深受启发，现将欧洲相关国家的生动案例摘编如下，以飨更多读者。

一、英国“全伦敦绿色网络计划”实施成效

英国大伦敦政府于 2012 年提出“全伦敦绿色网络计划”，旨在建设高质量的绿色空间网络和以河流为依托的绿色廊道。该计划实施过程中大量采用生态仿生设计，把现代技术与自然规律完美结合。

在伦敦位于河滨的布朗菲尔德区，整个开发过程中都力求维护该区遗址的生态系统的服务价值，社区花园采用生态仿生设计，用于向居民展示当地野生动物，指导人们如何实行生物多样性保护。伊丽莎白女王奥林匹克公园采用生态仿生设计方法建设绿色屋顶，在其上面安装太阳能光电板，用于监测开发情况，并采用生态位方法来量化评估实施效果。东伦敦大学利用废旧材料构建甲虫保护区，嵌入城市开放空间，发挥拯救稀有的甲虫和改造棕地的双重效果。此外，伦敦还规定在全市 40% 的房屋上面建设绿色屋顶，连同沼泽地、雨水花园和池塘等构建综合可持续使用的城市排水系统。为了监管该计划的落实情况，大伦敦政府要求每个项目根据 24 项关键绩效指标发布年度监测报告，其中包括增加城市绿化面积、减少碳排放，保护环境和改善蓝带网等。

英国“全伦敦绿色网络计划”实施活动扎实推进，成效喜人，值得学习推广。

二、德国柏林和斯图加特的绿色发展

德国柏林使用生态因子管理法确定绿色空间的比例和优先区域，据此制定了栖息地网络保护规划、自然环境规划、绿色空间规划、城市空间规划和城市减灾规划。在绿色廊道建设方面，柏林提出把绿带作为城市增长的边界和防止城市蔓延的屏障。柏林于 2004 年业已建成 20 条绿道把城市住宅区与休闲区相连接，共计超过 500 千米的道路组成互相连通的绿色网络。在城市空地利用方面，柏林提出城市空地转型方案，主要对废弃铁路、城市机场实施绿化改造。2009 年克罗伊茨贝格区由下而上发起“游动园艺”倡议，租用暂时空置的城市空间用作社区园艺活动，并为社区供应食物，租期由市政府定期更新。该项目具有“移动性”“灵活性”特征，有效地提高了城市土地利用率。

德国西南部的斯图加特位于河谷盆地，气候温和，风速微弱，空气流动性较差，而大量工业活动加剧了城市空气质量的恶化。20 世纪 90 年代该市率先把气候地图应用于指导城市土地利用规划，提出建设通风廊道，依靠自然风模式和密集的植被来解决热岛效应和空气污染等难题。该市通过气候地图描绘不同的风环境特征和地表特征，据此划分气候类型区，设置通风廊道，并将其与河流、公园、草地和轨道交通等相互连接组成绿色空间网络，保证城市的通达性。该廊道周边严格控制建筑物高度，确保自然风进入市区。

三、荷兰城市绿色空间的拓展

荷兰最大城市阿姆斯特丹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水城，河道纵横交错，海拔极低，雨洪灾害频发，为此“与水共生”成为该市发展的重要理念。从2010年起该市提出“结构性愿景：阿姆斯特丹2040”“阿姆斯特丹绿色议程”等城市规划，发起覆盖社区公园到整个市域的绿色空间倡议，包括在荒地建设“邮票公园”，发挥削减径流和调蓄洪峰及以蒸发冷却促使城市降温作用。公园也为人们提供了休闲场所，使人们避开敏感性生态区，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该市建设绿色屋顶和墙体，发挥截留雨水、提供蔽荫和净化空气等功能，改善居民健康，并提升城市环境形象。

该市以绿色廊道为纽带，连通城市各处空间，打造慢行自行车道，减少公共交通领域的废气排放。并推行三角洲计划，通过人工培育沙滩、沙丘补给和植树造林等，御防洪水，并以“把土地还给水域”的做法确保水资源供应。为了推动公众参与相关活动，该市开发了气候适应工程手机软件，便于人们能同步观察当地气候实况，参与城市公园的建设和维护之中。

四、丹麦城市的“口袋公园”和“绿色循环路线”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曾经面临严峻的人地矛盾。2009年该市启动“口袋公园”计划，以拓展城市绿色空间。该公园在空闲的建筑用地或小而不规则的土地上建设，构成城市内部“肥沃的小绿洲”，发挥调节温度和减少径流等作用，并为居民休闲娱乐提供场所。在高度城镇化地区，“口袋公园”避免了大规模开发和土地利用，成本低廉而更具灵活性。2015年该市打造了绿色循环路线“克里斯钦港环线”，把现有和规划中的公园、自然区域与休息区域相连接。如今该市有60%的居住区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公园或相关自然风景区。同年“哥本哈根庭院花园”规划出台，计划在2025年之前把城市庭院改建成高质量花园，从而致力于实现“绿色首都”“零碳排放”的雄伟目标，令人鼓舞。

五、白俄罗斯泥炭地治理初见成效

白俄罗斯低平的地势和温和湿润的气候造就了丰厚的泥炭资源，泥炭地覆盖全国15%的区域。泥炭提取后该地区逐渐退化直至被废弃。而该地排水系统往往继续运转直至把泥沼水抽干。由于缺乏水分导致植物锐减，腐烂植物累积和泥炭干燥的土地上层使退化的泥炭地极易着火燃烧，引起野火蔓延。

在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全球环境治理基金的支持下，白俄罗斯开始着手泥炭地的重新规划和改造以及可持续管理。该项目成功测试了12块受改造的泥炭地恢复水文系统的各种方法，并逐渐推向全国，计划到2030年恢复面积将达50万公顷。泥炭矿山企业也参与到治理活动之中。此项工程的普遍做法乃是在泥炭提取之后，让废弃矿床再度进水湿润。密集的泥沼地成为二氧化碳的重要吸收源。被废弃的泥炭地在水位提升和浸泡后变为养鱼和种植果木的场所。这样还有利于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为人们带来切实的效益。

综上所述，欧洲有关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根据对生态系统的不同利用方式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直接利用未经干预或最小化干预的生态系统，如以自然通风净化空气、以城市绿地管理雨洪；二是修复生态系统，如棕地治理以恢复生态系统功能；三是模仿自然规律创造相关生态系统，如新建绿色屋顶和外部墙面等以调节微气候。

参考文献：

庄贵阳、薄凡：《从自然中来，到自然中去——生态文明建设与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光明日报》2018年9月12日第14版。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原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原常务副院长，2018.9.26.）

聚焦生态脱贫，助力脱贫攻坚

——基于对陕西省宁陕县生态脱贫模式的调研与分析

郑治豪

十九大报告提出，要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确保到二〇二〇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做到脱真贫、真脱贫。脱贫攻坚事关全面小康社会的建立，事关民族复兴伟大目标的实现，在我国的经济背景下，如何顺利有效地开展扶贫工作，一直是各级政府的重点、难点。尤其在“老少边穷地区”，更面临着贫困人口众多、扶贫开发周期长、常规扶贫手段难以奏效等问题。

为探索研究精准扶贫有效途径，我深入陕西省宁陕县，通过座谈了解、实地考察、走访农户等方式，全面调研了该县精准扶贫之路。宁陕地处秦岭中段南麓，总面积 3678 平方公里，辖 11 个镇 68 个村 12 个社区、7.4 万人。是全国扶贫开发重点县，全县 40 个贫困村，其中深度贫困村 5 个，贫困人口 4476 户、11146 人，贫困发生率 18.72%，全县摘帽时间为 2019 年。该县 2017 年脱贫退出 6 个村、682 户 2259 人，目前还有贫困村 34 个（深度贫困村 5 个），贫困人口 3847 户 9028 人，贫困发生率 15.2%。2016 年被省委、省政府表彰为全省扶贫绩效考核优秀县，2017 年荣获市脱贫攻坚绩效考核优秀县。作为中共中央办公厅联县扶贫工作领导小组，十三五以来，该县充分发掘应用自身自然资源优势，积极致力于打造生态资源强县、生态经济大县，以生态经济理论为指导，建立高效率的人工生态系统，将农业、林业以及其他方面的经济活动有机结合，形成了经济建设、生态保护和脱贫攻坚协同发展路子。

一、贫困的标准和监测

（一）贫困标准的定义：

作为衡量贫困发生率等关键指标的主要参考依据，贫困标准的设定对于我国的精准扶贫工作具有重要意义。根据社会大众的共同认知，贫困主要表现为存在于衣、食、住、行等方面的困难，以及无法承担一些基本生活服务如教学、医疗带来的经济负担等。截至目前，世界范围内的各个学术组织仍然无法就贫困的定义得出统一的结论，贫困标准的测定仍然是一项具有极高关注度的热点研究问题。

（1）学者对贫困的解释：英国现代著名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其于 1776 年出版的著作《国富论》中首次对贫困做出了定义，即：“一个人所能够负担的生活资料的品质与数量，决定了该经济个体的富裕程度。生活资料的短缺，即是对贫困的最直观定义。”英国的朗特在《贫困：对城市生活的研究》（1901 年）中提出：“个体或家庭为维持基本的生活需要，达到最基本的福利标准，则必须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和生活服务；因此，个体或家庭如无法承担基本的物质和服务，则为贫困的表现形式。”英国的汤森在《英国的贫困：家庭财产和生活标准的测量》（1979 年）得出的结论为：“对于社会的全部个体，如果未能具备基本的经济实力以满足食物需求、生活服务以及其他社交需求等方面的需要，即为当下的贫困个体。”美国当代经济学

家劳埃德·雷诺兹在其 1973 年出版的著作《微观经济学分析和政策》得出结论：“社会中的存在的贫困问题，实质是指个体或家庭无法达到应该具有的基本生活指标的社会现象。”1998 年曾获得诺贝尔经济学获奖者的印度学者阿玛蒂亚·森在其著作《贫困与饥荒》（1981 年）中首次引入用权利的思想看待贫困现象，他主张：“造成贫困问题的实质是贫困者权利遭到剥夺的实施，而不应简单地归因于其收入不足的问题。”

（2）国际机构关于贫困的观点：针对具有国际共性的贫困问题，欧共体于 1989 年发布的《向贫困开战的欧共体特别行动计划的中期报告》，该文献对贫困做出了明确定义，即：“贫困问题的实质应当被定义为个体或家庭所能享有的资源数量和品质十分有限，此一事实直接导致了这些贫困个体无法满足本国生活所必须的生活条件，从而产生一系列的生活困难。”

在研究如何界定贫困的过程中，世界银行发布了聚焦于“贫困问题”的《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该报告指出，贫困的具体表现形式为“居民的生活条件未能满足最基本生活需要”的形态，所谓“最基本生活需要”，同时也被广泛定义为“贫困线”。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即 UNDP）于其发布的《2010 年人类发展报告》文献中提出了“多维贫困指数”的概念，是一项能够用来衡量贫困发生率的全新技术指标，将更多生活标准纳入了贫困的界定范围之中，这一创新使得人们能够更加广泛、全面地认知贫困问题，更多地从卫生条件、教育资源等领域探寻引起贫困的根本原因。

当今社会条件下，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导致贫困问题的绝不仅仅在于居民的人均收入过低，而是涉及到了居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具体表现为住房问题、财产使用不当、资源未合理开发、权利意识缺乏、风险降解能力不足等问题，甚至导致了許多已经脱贫的居民重新“返贫”。因此，要客观、彻底地认知贫困问题，需要同时衡量各项发展指标，并通过对其进行加权，得出具有说服力的数据。联合国提出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指出，要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不仅要解决当前存在的经济资源配置极端不平衡问题，还需进一步落实各项社会保障制度，促进社会经济资源配置合理化，使每一个社会个体都能平等享有利用经济资源的机会，从而获取最大的社会价值。对此，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等研究机构立足于教育资源、卫生条件、生活标准等指标，得出全面的贫困因素。

关于精准扶贫问题、“两不愁、三保障”是对当前脱贫工作的高度概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开发贵在精准，重在精准，成败之举在于精准”，明确要求各地要切实做到“六个精准”。这“六个精准”说明了当前贫困问题需要从多个角度全面入手、共同着力，要考虑到导致每个贫困个体发生贫困的内在因素，并以之制订切实的脱贫办法，即要“因户施策，因人施策，扶到点上，扶到根上”，力争实现截止 2020 为止确实做到“两不愁、三保障”。“两不愁”的核心脱贫目标，“两不愁”即解决农村地区居民在饮食、衣着方面的困难问题；“三保障”则是指为农村地区居民提供卫生条件、教育资源以及居住安全等方面的基本需求。“两不愁、三保障”的核心脱贫目标，在立足于贫困居民所需的基本保障基础上，同时为我国进一步扶贫工作的开展勾画了宏伟蓝图，脱贫工作的道路得以进一步具体化。“精准扶贫”和“两不愁、三保障”也为我国扶贫工作的开展过程注入了全新活力和不竭动力，有利于我国扶贫工作持久高效运行。

（二）我国农村贫困标准测算方法：

贫困标准也称贫困线。中国现行的农村地区贫困界定方法，一般表示了在社会发展条件下，居民要满足自身的最低生活需要，所不可或缺的经济或物质需求，包括食物、服务等方面。这一界定方法也在实质上呼应了世界银行制订的贫困“相对标准”的测算办法，具有较强的实践性和说服力。

在此定义的基础上，我国的贫困监测将结合世界银行通行的具体测算办法，制定出符合我国基本国情的贫困监测方案，同时计算出居民对服务的具体需求（包括最低非食物需求线和较高实物需求线），由此得出我国农村的具体贫困测量标准，也就是食物需求与非食物需求之和。

表 1 1985 年和 2014 年我国农村地区住户食物开支金额调查表

项目		单位	1985 年	2014 年
综合 平均价	粮食（原粮）	元/公斤	0.43	2.48
	蔬菜	元/公斤	0.2	2.96
	猪肉	元/公斤	3.44	18.39
	鸡蛋	元/公斤	2.52	9.53
基本食品 消费所需 支出	每天 1 斤商品粮		0.288	1.653
	每天 1 斤蔬菜		0.098	1.478
	每天 1 两肉或者 1 个鸡蛋		0.174	0.794
	合计		0.561	3.924

数据来源：全国农村住户调查和居民收支和生活状况调查。其中综合平均价是住户调查中农户出售和购买价格的简单评价。其中，原粮对商品粮的折算系数是 0.75。

（三）中国农村贫困标准测定与国际的关联与异同：

世界银行是国际社会研究贫困问题的主要机构，通产说的国际贫困标准一般就是指世界银行发布的贫困标准。目前，世界银行主要用每天 1.9 美元和每天 3.1 美元标准衡量发展中国家贫困状况。这两个标准都以 2011 年为价格基数。

国际贫困标准按价格基期不同，数值也有所不同。以国际极端贫困标准为例，世行在《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中采用了按 1985 年的价格计算的标准，为每人每天 1.01 美元，这就是全球熟知的“1 天 1 美元”标准。世行后来更新了价格基期年份，按 1993 年价格为 1.08 美元，按 2005 年价格为 1.25 美元，按 2011 年价格为 1.9 美元，年份不同，标准的数值不同，但其仍为“1 天 1 美元”标准。

2008 年开始，世界银行发布“1 天 2 美元”标准，这是用 2005 年价格计算的，如用 2011 年价格计算则为“1 天 3.1 美元”，为区别于极端贫困标准，有时也将此标准成为“一般贫困标准”。世界银行发布的有关贫困标准如表 2。

表 2 世界银行采用的国际贫困标准

极端贫困标准				一般贫困标准	
数值（美元/天/人）	发布年份	价格基期年份	测算方法	数值（美元/天/人）	测算方法
1.01	1990	1985	12 个最穷国的最高标准		
1.08	1994	1993	10 个最穷国的评价标准		
1.25	2008	2005	15 个最穷国的平均标准	2	发展中国家贫困标准中位数
1.9	2015	2011	同上	3.1	同上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相关年度《世界发展报告》。

我国农村贫困标准与国际贫困标准的比较方法。以每天 1.9 美元的国际极端标准为例。世界银行按 1 美元=3.696 人民币的购买力平价指数换算（参见世界银行 2015 年《购买力平价与世界经济的真正规模》），每天 1.9 美元贫困标准以人民币表示为 2011 年每年 2564 元，对应了我国城乡平均物价水平。考虑到中国城乡有 30%左右的物价差异，农村贫困标准的人民币表示为 2100 元。2011 年我国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是 2536 元，按上述购买力评价指数计算约相当于每天 2.3 美元。因此，我国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是每天 1.9 美元的 1.21 倍，是每天 3.1 美元标准的 74.2%。若考虑“保障基本住房”，将农村居民自有住房折算租金算进来，我国现有标准比 2.3 美元要高 20%。若将“三保障”内容全部考虑在内，则代表的标准还要高。

在使用国际贫困标准过程中，要注意的是：一是国际贫困标准主要用于国际比较。反映我国扶贫成就、制定相关政策，应主要使用我国现行农村贫困标准及测算的相关指标和数据。二是采用国际标准进行国际比较时，要说明所用的是哪条标准、是哪年的数据以及数据来源。三是采用不同的标准，不仅要同时采用其标准值，还要采用根据该标准测算的贫困人口、贫困发生率等指标数据。标准值与其对应的指标及数据是完整统一的。

（四）贫困监测方法：

我国贫困监测以国际上同行的住户调查为基础。农村住户调查从 1954 年开始实施，60 年代中断，改革开放后恢复。国家统计局采用科学系统的抽样调查方法，直接向调查户收集生产消费、出售购买、人口就业、住房条件、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等详细信息，用于分析计算农民收入、消费等宏观经济指标，测算贫困标准和贫困人口，同时，通过对分户数据的挖掘，各种交叉分组，可以深入分析影响收入、贫困的各种因素。

（1）贫困监测调查：

调查范围：贫困监测包括两项调查：一是全国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调查范围覆盖全国，目的是反映全国和分省农村贫困状况，样本分布在所有市区以及三分之一的县。二是国家农村贫困地区和国家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四省藏区及南疆三地州的所有地州，以及其他片区的所有县。

抽样方法：采用分层多阶段等距随机抽样方法，两项调查从全国抽取 20 万个调查户，调查结果对全国、分省、分片区有代表性。具体方法是：以省为单位，先按市区和县域分层：对所有市区开展调查；县域按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排队，按人口规模等距抽取三分之一的县开展调查。在每个区县，采用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建立的抽样库，采用入样概率与人口规模成正比的的抽样方法，抽取普查小区（自然村）。根据小区内住宅分布图，等距抽取住宅和住户。

直接调查：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由国家统计局分布在各地的直属调查队根据统一方案和工作流程，组织调查户记账，年末季末入户访问调查。调查户每天要及时记录收入、支出、生产、出售、购买等情况。年末季末由调查员入户收集调查户住房和生活设施，家庭成员的人口特征、社保、教育、健康、就业状况，以及所在社区的基础设施与基本公共服务等情况。国家统计局在每个调查村聘请辅助调查员，督促帮助调查户记账。县级调查队和统计局直接将记账和访问调查数据上报国家统计局。国际统计局根据对 20 万调查户的分户数据汇总全国、分省、分片区调查结果。

严格审查：根据各地社会、经济、气候、扶贫的背景资料，对调查资料进行分析，防止漏报和虚报。国家统计局对各地上报的所有分户数据进行认真审核，每年对一半的省直接进行现场抽查，每个季度随机抽选 6000 个调查户进行电话回访，确保调查质量。

（2）贫困测算指标：

贫困人口规模：指人均收入或消费低于贫困标准的人口总数。世界银行用人均消费衡量贫困，欧盟用人均收入衡量贫困。我国主要用基本生活消费支出衡量农村贫困状况。

贫困发生率：贫困发生率也称贫困人口比重指数，指人均收入或消费支出达不到贫困标准的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另外，为了更深入为政策提供参考，有时也使用一些其他贫困指标，包括：

贫困缺口：贫困缺口是使所有贫困人口脱贫需要的收入之和，一般可用于测算保障性扶贫资金需求。

贫困缺口率：贫困缺口率也称贫困深度指数，指贫困人口离贫困线的距离之和占所有人脱贫需要的收入之和的比重。如果贫困发生率一样，贫困缺口率大的地区贫困程度更严重，脱贫难度更大。比如，有两个贫困人口，一个收入只有 2000 元，一个是 2500 元，前者更贫困。使用贫困缺口率可以更客观反映扶贫成效。在上例中，通过扶贫，两者收入都增加 500 元，若用贫困发生率衡量，只有脱贫才算反贫成就，扶持后者显然更加易出成果。但若用贫困缺口率，在两者身上取得的成就都一样。

加权贫困缺口率：又称贫困强度指数，计算方法与缺口率基本一致，只不过给更穷的人以更大的权数。这样，在上例中，如果优先扶持 2000 元收入的贫困户，反映出来的扶贫成效比扶持 2500 元收入的贫困户更大。

贫困发生率、贫困缺口率和加权贫困缺口率通称为贫困指数。其通用公式如下：

$$P_{\alpha} = \frac{1}{N} \sum_{i=1}^q \left(\frac{Z_p - Y_i}{Z_p} \right)^{\alpha}$$

这里， Z_p 为贫困线支出， Y_i 为第 i 个穷人的支出或收入， N 为总人数， q 为个人支出或收入低于贫困线的人数。

如果 $\alpha=0$ ，指数 P_{α} 就成为 $P_0 = \frac{q}{N}$ ，这就是贫困人口比重指数， P_0 是贫困线下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

$\alpha=1$ ，贫困指数 P_{α} 表示“贫困缺口率”，或者表示贫困深度指数。

$\alpha=2$ ，贫困指数 P_{α} 表示“加权贫困缺口率”，或者表示贫困强度指数。

（五）我国农村脱贫成就的数量分析：

国家统计局《201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按照每人每年 2300 元（2010 年不变价）的农村扶贫标准计算，2015 年农村贫困人口 5575 万人，比上年减少 1442 万人。农村贫困监测调查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7 亿多人，中国对世界反贫困事业做出巨大贡献。近年来，脱贫步伐进一步加快，扶贫成效非常显著，但扶贫任务仍很艰巨。

（1）扶贫成就巨大。按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测算，1978 年农村居民农村贫困人口规模 7.7 亿，贫困发生率为 97.5%；2015 年农村贫困人口降到 5575 万，贫困发生率 5.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减少 7.1 亿人，贫困发生率下降近 92 个百分点。

（2）东中西部地区同步推进。根据 2015 年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不同地区的贫困人数在数值上各自占到全国贫困人数比例的 11.7%、36.0% 以及 52.3%。根据 2010 年的统计数据，我国在东部各省份有超过 1934 万人成功实现脱贫目标，成功摆脱贫困的人数占到 2010 年东部各省份贫困人数总和的 74.7%，在我国各地区中具有最高的脱贫速度。中部地区 3544 万人脱贫，脱贫比例为 63.8%。我国的西部各省份脱贫

人数达到 5516 万人，占到西部各省贫困人数总和的比例为 65.4%，在我国各地区中占有最大的脱贫比例。

（3）贫困地区贫困人口大幅下降。截止 2015 年，在我国各地的贫困山区中，共分布有农村居民及贫困人数共计 3490 万人，这一数值相比 2012 年的数据已经实现了 2549 万人的成功脱贫，平均脱贫速度为每年 850 万人。

（4）对比全国农村平均水准，贫困地区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更快。结合 2015 年的统计数据，当前在我国贫困山区地带，农村居民的平均可支配收入为 7653 元，在 2012 年到 2015 年的这段时间内，平均可支配收入的数额增长比率达到 13.7%，这一速度相较全国农村的平均收入增长已经快出了 2.9%。这一结果显示，贫困山区地带的居民正在不断缩小与全国农村平均收入的差距，尤其是在 2015 年，我国贫困山区地带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已经占到了这一指标全国平均水平的 67%。

（5）贫困山区地带农民的住房水准正在快速提高：

2015 年全国农村居住竹草土坯房的农户比重为 3.3%，比 2013 年低 0.7 个百分点；饮用水无困难的农户比重为 88.1%，比 2013 年高 2.5 个百分点。每百户汽车拥有量为 13.3 辆，比 2013 年增加 3.4 辆；洗衣机 78.8 台，增加 7.6 台；电冰箱 82.6 台，增加 9.7 台；移动电话 226.1 部，增加 26.6 部；计算机 25.7 台，增加 5.7 台。在这一方面上，贫困山区地带则展现出了更大的进步空间与发展潜力，同时也在不断压缩与全国平均水准之间的距离，逐渐成为推动我国农村居民住房消费的“主力军”。

（6）以贫困山区地带为代表的农村地区建设工程大力落实：

得益于中央贯彻多年的大力发展，我国已经实现了用电、修路、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在全国范围农村地区的整体覆盖。根据 2015 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完成了乡村主要公路硬化工作的行政村占到了全县的 94.1%，全县内已有超过 60.4%的自然村实现了垃圾回收处理的集中化管制，已有超过 79.7%的自然村实现了解决农村孩子上幼儿园难的持久性问题，超过 83.4%的行政村为农村住户提供了较为方便的小学教学资源，分别比 2013 年提高 3.6、1.4、3.6 和 2.1 个百分点。在我国全国范围内的贫困山区地带已经切实开展了基础设施与服务的整体性提高工作，这也将大大加快贫困山区追赶全国平均水平的进程。

（7）“十三五”扶贫工作仍然任重而道远：

主要难点是：一是省际贫困状况差距很大。截止 2015 年期间，我国共计有 5 个省市达到了基本消除贫困的任务目标，但是，贫困人数超过 300 万人的省市仍多达 8 个，贫困发生比率超过 10%的省市同样也有 8 个之多。除此之外，针对我国贫困山区地带，地理位置较为封闭、经济发展起步较慢、综合条件整体不利的 8 个贫困地带，其相应的贫困发生率也超过了 15%。三是大量的农村居民未能实现长期持久脱贫，时常会出现部分居民因为某些原因而重新转入贫困状态，这些都是精准扶贫所面临的重大挑战。除此之外，农村地区的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问题，仍然在时时考验着扶贫工作人员解决问题的本领与智慧。

二、生态脱贫的背景

（一）精准扶贫的涵义与作用

精准扶贫是我国社会现阶段扶贫开发工作的一系列全新方案，也作为上个阶段粗放扶贫方案的新思路。在此之前，我国的扶贫开发过程的重点，即存在于解决对政府贫困帮扶政策资源的汇总、归纳以及运用方式等等一系列的问题，然而，对政策资源的整合、落实以及评价等各个层次上的“疑难杂症”，始终缺乏

行之有效的政策方针，这也造成了当前对标准贫困农户帮扶工作中存在许多盲点，扶贫资金、项目等资源无法准确到村到户，常常出现应扶未扶、扶富不扶穷以及大水漫灌等问题。精准扶贫政策则针对不同贫困区域环境、不同贫困农户状况，运用科学有效的贫困对象识别机制，确保扶贫资源真正用在农户身上、真正用在贫困的地方，从而提高我国扶贫工作的精准度，从而保证扶贫工作的实际成效。

（二）精准扶贫的方式与创新

为保证顺利达成精准扶贫的战略目标，我国已经贯彻落实了一大批确保精准扶贫工作有效展开的相关执行方案，包括：对贫困户的精确识别与考核机制，明确干部驻村工作帮扶机制，建立金融扶贫机制，完善贫困农户的收益机制等等。更重要的是，地方各级政府结合贫困地区的区域性特点，建立相应的产业帮扶制度，从根本出发，在带动地区产业全面发展的同时，激发贫困户参与经济活动的热情与才能，培养老百姓自身潜在的发展能力。

（三）宁陕县生态脱贫现状

宁陕县位于秦岭腹地，总面积 3678 平方公里，辖 11 个镇 68 个行政村 12 个社区，7.4 万人，其中农业人口 6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4476 户 11461 人。脱贫攻坚战以来，该县立足森林覆盖率 90.2% 的资源优势，依托绿水青山的生态优势，坚持以生态文明建设引领县域经济发展，把资源优势 and 生态优势变成全县最大的脱贫资源和发展资源，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努力推动生态建设与脱贫攻坚深度融合，坚持走绿色脱贫之路，通过激活释放生态红利把“绿水青山”变成贫困户的“金山银山”，积极探索“生态+”扶贫的实践样板，打造群众脱贫致富“金饭碗”，生态扶贫成为宁陕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强大动能。

三、生态脱贫的实践

（一）以全域旅游发展为引领，创新秦巴山区旅游脱贫模式

宁陕县凭借良好的生态优势，强劲推动旅游开发，建成了悠然山高山湿地、秦岭峡谷乐园、筒车湾欢乐水世界、上坝河国家森林公园、秦岭金丝猴观赏园等一批景区景点，创建国家 3A 级、4A 级景区和省级旅游度假区各 1 个，形成了“四区两漂一园一城”特色旅游产品。该县大力实施旅游带动脱贫，全县旅游从业人员 7300 多人，游客年接待量达到 380 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突破 20 亿元，2016 年—2018 年带动 468 户贫困户、1554 名贫困人口脱贫，乡村旅游接待人数占到年游客接待量的 40%，成为群众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旅游带动脱贫的做法，被省旅游局推荐国家旅游局，参评全国旅游产业改革发展创新奖。

一是坚持精准施策，探索旅游扶贫新路径。充分发挥旅游产业吸纳带动能力强的特点，通过核心景区直接带动、乡村旅游创业带动、资源资产入股带动、旅游商品开发带动，创新脱贫攻坚新路径。（1）核心景区带动就业脱贫。推进上坝河省级旅游度假区、悠然山高山湿地景区、秦岭朝阳沟等景区建设，打造精品景区景点，形成核心旅游产品，增强旅游吸引力。景区在劳务用工、农副产品收购方面向贫困村、贫困户倾斜，全县景区务工就业 800 人以上，其中贫困人口就业占比达 20% 以上。（2）乡村旅游带动创业脱贫。通过核心景区建设，带动景区周边乡村旅游发展，实施七里村、青龙垭村旅游脱贫试点村建设，开展月河村、海棠园村、桅杆坝村等 7 个国家旅游扶贫村建设，加快长安河、东河沿线、汶水河沿线、旬河沿线 4 条乡村游示范带建设，培养和扶持 100 户农家乐、乡村酒店，解决农村人口就业 2000 人，其中贫困人口就业 300 人。（3）资源入股、投工投劳带动增收脱贫。采取企业+合作社+农户（贫困户），能人带动等多种模式，流转贫困群众闲置山林、果园、土地、房产等生产资料和资源，参与村级合作经济组织，投资合作参股，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组织，拓宽贫

困户增收致富渠道。（4）开发旅游商品造血脱贫。发展旅游食品和旅游手工艺品等特色旅游商品，培养旅游商品企业和品牌，促进农副产品增产扩销，切实提高农民收入。整合食用菌、猕猴桃酒、蜂蜜、豆腐干等特色旅游食品，包装提升根雕、木雕、石艺、藤编等特色手工艺品档次，形成相对统一的品牌形象对外宣传推广和销售。

二是坚持政策驱动，增强旅游脱贫实效。（1）用地保障政策。纳入我县重点项目盘子的旅游项目，在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中优先予以保障。鼓励支持经营业主依法利用荒山、荒坡、荒滩进行乡村旅游开发。（2）金融信贷政策。鼓励经营业主通过银行贷款建设农家乐、乡村酒店、家庭旅馆，给予一定的扶持。（3）对口帮扶政策。凡2015年后新评为且享受政府奖补的国家3A级以上景区、享受年度“一县一业”扶持的旅游项目、三星级以上宾馆（酒店）和重点扶持的旅游产品生产加工等企业，安排吸纳贫困人员的就业比例不得低于企业总员工的20%。（4）奖励支持政策。对于吸收贫困人口务工就业不低于景区当年员工总数20%以上，在陕南循环发展、旅游基础设施建设、文化阵地建设和“一县一业”奖补资金、用地保障方面优先考虑。（5）取得国家无公害认证、有机食品认证、地理标志认证、出口认证等的，获得国家级、省级、市级名优旅游商品称号的，分别给予奖励扶持。

三是彰显特色优势，形成四种扶贫模式。（1）秦岭开发的“蒿沟模式”。广货街镇蒿沟村以乡村旅游为引领，大力发展沟域旅游经济，带动了山林经济和特色养殖业的发展，全村发展农家乐（宾馆）96户、个体运输业57户、冷水鱼养殖21户，涌现出了一批标准圈舍养殖、林下养殖、核桃板栗种植大户，带动了当地的白灵菇、杏鲍菇、鸡腿菇等食用菌产业，带动就业创业200余人，全村农民人均收入从2008年的2300元增至2016年的21000元，成为远近闻名的富裕村。（2）社区性开发的“皇冠模式”。采取市场化运作，依托企业实施社区性开发，带动群众致富。西安海荣集团，云南城投集团合资打造皇冠健康小镇，在集镇区位好、商业价值高的新区为迁户新建框架式安置社区，每户一栋房屋，一层商业店铺，二楼生活用房，在企业用工上优先使用当地群众，引导搬迁群众发展农家乐及三产服务业，从一产转移到三产，实现了从农民到市民的华丽转身，全村32户123人通过景区建设搬迁实现脱贫。（3）协会+农户的“元潭模式”。元潭村毗邻秦岭峡谷乐园景区，依托黄波菌业专业合作社，带领群众发展袋料食用菌产业，发展会员110户，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协会统一加工销售，为来宁游客提供特色旅游商品，有效地解决了菇农的生产销路问题，带动了群众增收致富。（4）股份制开发的“漫沟模式”。农户以山林资源、投资入股，按股分红，带动群众尤其是贫困群众的脱贫致富。广货街镇漫沟天成渔业专业合作社有会员108户，其中贫困户56户，开发的宁陕漫沟生态观光园，年接待游客10.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2100万元。该合作社已入选为全国61个“协会+农户”旅游扶贫示范项目之一。

（二）生态脱贫，点“绿”成“金”

宁陕县是全国生态林业大县、全省重点林区县，全县林地面积498万亩，其中集体林地306万亩，农民人均林地达50余亩。该县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和深化林业改革、加快生态建设、培育富民产业、建设美丽乡村相结合，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引导贫困群众发展“绿色产业”，把绿水青山打造成绿色银行，走出了一条林区生态修复和脱贫攻坚共赢的路子。（1）聘请生态护林员，实现部分贫困人口当年脱贫。从2016年9月起，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择优吸纳有劳动能力的812名贫困群众担任生态护林员，人均管护面积500亩以上，每人每年基本工资为7000元，一年一聘，直至脱离贫困，生态护林员政策覆盖了全县25%的贫

困户，人均增收 2300 多元，加上退耕还林、公益林补偿、林果产业收入实现了当年脱贫目标。（2）实施林业重点生态工程，促进贫困人口增收。在实施项目时政府优先采购合作社的产品服务、优先聘用有劳动能力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参与项目建设，增加贫困群众劳务收入。2016 年落实中幼林抚育项目资金 220 万元、造林绿化项目 360 万元、林下经济项目资金 780 万元、核桃产业提质增效奖补资金 515 万元。这几项工程的实施带动了 300 户贫困户户均增收 3000 元以上。（3）提高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增加贫困人口收入。从政府层面加大投入力度，形成县级财政扶持生态保护及林下经济发展的长效保障机制。2016 年，宁陕县在全国贫困县中第一个用县本级财政投入生态补偿，当年安排资金 650 万元将 65 万亩地方公益林补偿标准由 5 元每亩提高到 15 元每亩，生态补偿提标惠及全县 32397 户群众，仅此一项贫困户年人均新增收入 180 元。全县 40 个贫困村的 73.6 万亩国家级生态公益林、41 万亩地方公益林的生态补偿，贫困户每年户均补偿资金达到 320 元。（4）加大退耕还林力度，提升贫困人口阶段性收入。2016 年落实 1.15 万亩退耕还林面积，在实施新一轮退耕还林过程中，优先安排贫困村，覆盖全体贫困户，为每个符合退耕还林条件的贫困户规划落实退耕还林人均 1.5 亩以上，实现退耕还林项目户年均增收 1800 元，全县贫困户每年因退耕还林政策补助人均增收 787 元。（5）深化集体林权改革，增加贫困人口资产性收入。率先将 306.2 万亩集体林地落实到户、颁发了 1.73 万本林权证，林权发证率达到 99%。开展了林权抵押贷款业务，2016 年底林权抵押面积 3.17 万亩，累计发放林权抵押贷款 6337 万元；林地流转累计 74 万亩，总交易额达 7 亿余元。积极创新开展林地“三权分置”改革，开展公益林预收益抵押融资，加大林地经营权流转，发放了全省首批公益林预收益抵押贷款 180 万元。

据统计，2016 年全县农村人口依靠林业产业人均增收 1850 元，依靠林业资产入股分红、融资收益和退耕还林、公益林生态补偿、生态护林员等，转移性收入人均达 1394 元，全县农民人均林业收入 3240 元。2016 年林下经济总产值达 4.6 亿元，林业收入（含生态旅游）占全县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比重达 70%以上。

（三）激活“金钥匙”，开启“致富门”

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宁陕县把金融扶贫作为带动发展的重要杠杆，实现政银联动，抓产品创新，破解贷款难题，抓评级授信，强化风险管理，抓指导服务，提高贷款效益，抓脱贫产业，实现增收致富，打造了具有“宁陕特色”的金融扶贫新模式。

该县财政出资在县农商银行开立贷款担保基金账户，先后注入信贷担保金 1100 万元，累计撬动信贷资金 1.2 亿元。县农商银行给予每户 5 万元“脱贫贷”授信，期限 3 年，免担保，免抵押，财政全额贴息到户，2017 年全县累计发放“脱贫贷”2357 户 9759 万元，为龙头企业发放贷款 3300 万元，重点支持林果、食用菌、猪苓、中药材、有机种植、特色养殖等产业发展。抓好村级互助资金，截至 2016 年底实现了 40 个贫困村互助资金的全覆盖，成立联保小组 683 个、贫困户会员 4759 户，占项目村总户数的 75%，互助资金总量达到 2200 万元，平均每个贫困村超过 50 万元，2017 年滚动投放村级互助资金 4926 万元。宁陕积极创新金融产品，先后推出惠农贷、小额贷、家乐贷、创业贷、扶智贷、林权贷、旅游贷、搬迁贷、产业贷和健康贷等系列金融扶贫惠农产品。各类资金贷款的发放，达到了“扶持一户、带动一片、推动一村、示范一镇、影响一域”的辐射带动效果，形成了精准扶贫新动力。

如何让贷款发挥效益？宁陕县建立了以银行为金融纽带，将基层党组织、贫困农户、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等紧密联系起来，建立了“银政、银企、银社、银农”四大互动平台，有效形成了政府积极支持、村组专人配合、银行有效跟进服务的工作体系，认真贷前调查、严格贷时审查、加强贷后检查，发挥扶贫部门、

包抓工作队、镇村组织的工作合力，保证脱贫贷款都用在产业扶贫上，落在实体经济发展上，服务精准度显著提升。

（四）创新兜底模式，助力脱贫攻坚

宁陕县在兜底保障全覆盖工作中主动谋划、先行先试、大胆探索、创新实践，兜底脱贫工作收效良好。2016年，宁陕县兜底保障贫困对象由年初的2009户3107人增加至年底的2638户4157人，占全县建档立卡贫困户总数的31%，兜底成效明显。

一是做到对象“一个不漏”。该县立足实际、多方研判，提出“1234”兜底脱贫思路，紧盯一个目标：确保兜底对象一个不漏。做好两项兜底：农村低保兜底和特困对象供养兜底。健全三项制度：进一步完善医疗救助、灾害救助和临时救助制度，有效遏制返贫。

二是实现制度“无缝衔接”。坚持“应保尽保，托住底线”原则，先后制定出台了《宁陕县社会保障兜底脱贫实施方案》，进一步加强扶贫政策与社会救助政策有效衔接，2016率先实现了扶贫线与低保线“两线合一”，农村低保标准由每人每年2500元提高到3015元，保证困难群众基本生活水平与全面小康相适应。五保老人是兜底保障的重要群体，为了实现全县五保对象“两不愁三保障”，制定出台了《宁陕县敬老院临聘人员“五制”管理办法》和《关于落实分散供养五保户脱贫攻坚监管责任的方法》，不断提升敬老院五保对象集中供养的管理服务水平，夯实分散供养五保对象与监护人“三同四一”（同吃同住同户口和一户一本一照协议）监管责任，让五保老人生活的有尊严、有关爱、有保障。

三是兜底就业互促共赢。建立了失能五保托养中心，失能托养中心的成立实现了全县所有失能五保集中供养，服务人员从建档立卡贫困户中公开选聘，既减轻了贫困失能家庭照护失能人员负担，又为部分贫困家庭提供了就业岗位，实现了兜底保障与就业脱贫互促共赢。

四、脱贫攻坚工作难点

一是农民增产不增收。由于农产品市场的需求刚性，农产品价格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仅产生了微小的改变，价格持续低迷，农民增产不增收。通过调查，宁陕县秦南菌业从事食用菌生产10多年，香菇的价格几乎没有大的变化，远远低于物价指数。农户发展畜牧业，如果遭遇疫情，就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虽然有较高的预期收益，但这样的高风险还是令贫困农户望而却步。

二是因病返贫风险大。农民一旦患上大病，住院治疗，就会负债累累，甚至失去劳动能力，使一个家庭彻底返贫。宁陕县现有在册贫困人口4476户11146人，2011年至2016年累计返贫1799户，其中，因病返贫1488户，占返贫人口的82.7%，成为制约脱贫的主要因素。

三是外出打工的隐患。年轻人外出务工，农村多为留守儿童和孤寡老人，长期分离使得外出子女无法为留守父母、孩子提供经常性的照料和关怀，家庭基础受到了动摇，这在很大程度上空巢人群的健康和福祉。

四是精神贫困务必重视。争当贫困户、争当贫困村的现象是存在的。这种现象蔓延非常危险，一方面不能够持续脱贫，贫困户的自力更生、内在动力没有发挥出来，就会“等靠要”，今天给了政策支持能够过下去，明天离开了政策就过不下去，所以脱贫肯定没有持续性。另一方面，这个风气蔓延下去，可怕的问题不在于贫困自身，可怕的问题是传统道德以及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强不息这种精神会被彻底丢弃。所以，精神贫困问题比物质贫困问题更可怕，我们必须要把解决精神贫困问题放在比解决物质贫困更优先的地位来解决。

五是形式主义让人担忧。“精准扶贫”核心在于能够准确帮扶到贫困老百姓的生活难处，而绝非只去做一些简单的走访调查填表工作。去农户家中拍几张照片，记一些数据，亦或是通过实物方式资助老百姓，搬一袋面、一袋化肥，一二百元去做所谓的“对口帮扶”，无益于从根本上改变贫困群众的生活状貌。

五、关于打赢精准脱贫攻坚战的几点建议

当前，脱贫攻坚进入攻坚拔寨关键期，农民增收是根本，精神扶贫是关键，资金保障是重点，要进一步规范扶贫资金整合与使用、增强产业发展输血与造血功能、理顺自力更生与帮扶关系，推动难题破解，确保脱贫实效。

一是坚持整合资金，提高使用效益。用好管好扶贫资金，发挥最大效益，事关脱贫攻坚战的成效。要坚持“整合项目、聚集资金、集中使用、精准扶持”原则，打破部门、年度、层级等范畴，将整合范围内的项目资金全部纳入整合，做到应整尽整。突出涉农整合资金使用重点，优先用于贫困村、贫困人口能够受益的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和脱贫产业项目，交通项目向进村入户倾斜，水利项目向贫困村小型农业项目倾斜，产业项目向贫困群众参与度高、受益面广的项目倾斜，建立项目清单，按照轻重缓急拨付、调度资金，最大限度发挥整合资金使用效益。

二是坚持因地制宜，选好选准产业。产业选择要因地制宜、因人制宜，选好、选准具有区域化、特色化和有收益预期的项目。比如：宁陕是林业大县，农民人均林地 50 余亩，就要依托山林资源，强化生态保护、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旅游产业，将绿水青山转变为“金山银山”。要围绕全县产业布局，坚持集中连片、规模开发，发展容易形成批量的山林产业，建设林果、药菌、特色养殖、有机种植基地，林下养殖以龙头企业拉动为主，有机农产品种植坚持园区化发展，通过有组织生产，达到一定规模。实行“一镇一业、一村一品、一户一策”，县抓农业园区、镇抓重点村、村抓示范户，坚持有特色、有基础、有主体、有效益、有市场，以村为单元发展区域性产业，充分考虑产业聚集度，形成商品量，实现贫困村产业全覆盖。

三是坚持市场导向，提升产业化水平。依靠贫困农户单打独斗、分散经营，很难面对市场，无法承担风险。因此，要以市场为导向，以园区为基础，坚持龙头企业带动，确保贫困户稳定增收脱贫。推进“三变”改革，通过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充分激活市场，壮大集体经济，提升产业化水平，释放农村集体资产、农户土地和农民财产红利，让农民获得持续稳定的收入。培育经营主体，壮大龙头企业，引领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工业化生产，延长产业链；培育农业园区，发展集种养、加工、服务、休闲观光一体，融和二二三产的复合型龙头园区，形成规模效应，引领产业发展。贫困村市场主体全覆盖、合作社全覆盖、县级以上农业园区全覆盖，改变农户自产自销、粗放经营模式，提升产业竞争力。农业产业的出路在于标准化，要严把农产品市场准入关口，大力实施标准化建设，确保产品质量过硬。以本地区特色优势产业为依托，集中力量整合产业，打造区域特色产业品牌。

四是坚持扶贫扶志，激发内生动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脱贫致富终究要靠贫困群众用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实现。大力推进新民风建设，制定村规民约，建立村民议事会，开展道德评议活动，教育群众诚实守信，不弄虚作假；主动赡养父母；刹住大操大办，减轻随礼负担；树立主人翁思想，以勤扶志，向善向好，倡导“家和万事兴”的正能量。注重政策宣传和情感交流，干部入户，反复宣讲，让群众充分了解贫困户评选、产业奖补、健康扶贫、搬迁危改等政策，化解群众矛盾，引导观念转变。开展树立“脱贫标兵”活动，培育产业大户和致富带头人，倡树自主脱贫典型，营造不等不靠、自力更生的氛围。提名叫响扶贫不扶懒，建立贫困户责任清单和负面清单，明确贫困户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禁止做什么，消除“习惯穷”“争当穷”“无奈穷”等思想顽疾，激发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内生动力。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财政税务学院）

中国乡土社会正在发生十大转变

刘 奇

2.8 亿农民工大流动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乡村要振兴，首先应认清乡土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的乡土社会发生着深刻剧烈的变化。但不管乡土社会如何转型、怎样变化，以乡为基点的活动空间不会变，以土为基础的生存依托不会变。乡村振兴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最强音，乡村要振兴，首先应认清乡土社会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

一、社会主体由稳定性向流动性转变

在传统农村，农民以土为生，与土为伴，相对稳定，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心无旁骛地在村庄中生活。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对土地的依赖，以廉价劳动力的形式进入城市，寻求新的发展空间，以此来改善自身的经济与命运，农民由稳定性向流动性转变。这种转变，既表现为水平空间上的跨区域跨领域，也表现为垂直空间上贫富差距带来的阶层变化。农民工四处奔波、走南闯北，2.8 亿农民工大流动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现象。农村有八九亿人口，除了外出打工的 2.8 亿，其余都生活在农村，外出打工使得农民的收入来源复杂多样，所从事的职业五花八门，农民之间的贫富差距趋于扩大，阶层流动也因此凸显。“流”是活力的表现，但应流得自主自愿，流得安心放心，流得后顾之忧。

二、社会生活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

在传统农村，农业生产特点和习惯相同，农民的生活相对同质，以家庭经营为主，传统村落形态也十分适合一家一户的生产生活方式。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大量走出村庄，异地打工，打破了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乡土社会的社会生活由同质性向异质性转变。这种异质性来源于不同地区之间、城市与农村之间生活方式的交汇。村庄的概念在交通通讯高度发达的今天，也已经冲破地理上的村域范围，村里人在外面有多少打工的地方，村庄的虚拟空间就会延伸到多少地方。身处远方的村民随时可以通过手机以及互联网了解村庄的一切。异质性的生活和虚拟空间的扩展，使村庄治理变得更为复杂。

三、社会关系由熟悉性向陌生性转变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世代聚族而居的熟人社会，它通过加强人际关系和相互信任引导熟人之间相互自愿合作。随着农民工的流动、乡村旅游的发展，乡土社会的社会关系由熟悉性向陌生性转变。这种转变逐渐打破了熟人社会的秩序，在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诚信；在生人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靠的是契约。如何让传统的诚信与现代的契约在乡土社会治理中共同发挥作用，是当下需要深入探讨的大课题。

四、社会空间由地域性向公共性转变

传统村落的传统农业，功能定位为单一种养业。随着农业多功能性的逐步显现和乡村旅游的蓬勃发展，

农业大步走出一产，融合二、三产协同发展，加上发达的交通通讯助力，乡土社会的社会空间由地域性向公共性转变。观光农业、休闲农业、都市农业、智慧农业等各种农业新业态方兴未艾，农业已远远不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形态，农业生产的场地成了人们观光旅游休闲的好去处，农业生产的方式成了人们科普、体验的新追求，农业生产的环境成了人们体悟人生、享受生活的理想地。乡村旅游被认为是中国农民的第三次创业：第一次创业，发展乡镇企业，离土不离乡；第二次创业，进城打工，离土又离乡；第三次创业，开发乡村旅游，既不离土也不离乡。开放的乡土社会空间为现代文明的注入打开了通道，拓宽了领域。

五、社会结构由紧密性向松散性转变

传统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在这个熟人社会中，人情是一种交往方式，是社会结构紧密的黏合剂；家园红利是一个熟人社会长期积淀的福利，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凝聚力、归属感，是“故土难离”“叶落归根”的原因所在。近些年来，由于农民工大量外流，乡村人情关系越来越淡薄，社会资本不仅少有积累，而且逐渐消蚀，乡土社会的社会结构由紧密性向松散性转变。在此情况下，必须重塑乡土社会的乡情乡谊，否则在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每个人所从事工作的价值比重越来越小的情势下，社会结构的离散将危及每个人的生存与发展。继承优秀传统文化，重塑“家园红利”应是当下中国乡村“软件”建设的重头戏。

六、社会细胞由完整性向破裂性转变

家庭是社会的基础细胞，中国农村传统的家庭观念是“父母在，不远游”“老婆孩子热炕头”。但随着农村大量青壮年外出打工，农民工家庭由完整性向破裂性转变，产生了“留守家庭”，形成了“三大留守群体”——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一万打工钱，三代离别泪”，“留守家庭”是社会稳定的隐患，如果“留守家庭”频频“后院起火”，变成了“问题家庭”，不仅是农民难以承受之重，更是社会难以承受之重。农村留守家庭为社会经济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破解农村留守家庭的“留守”之痛，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以家庭为流动单元应作为社会流动的基本准则。许多发达国家人口流动的流量占比之大不亚于中国，但都是以家庭为流动单元，社会细胞的稳定就不会使社会肌体受到损伤。

七、社会文化由前喻文化向后喻文化转变

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对人类文化的传播提出了“三喻”论，即“前喻文化”“并喻文化”和“后喻文化”。“前喻文化”是指年轻的要向年长的学习，在农业文明时代，文化的传承是前辈向后辈传递。“并喻文化”是指不需要先辈的经验积累，文化可以在同代人之间传播，这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文化传播方式。“后喻文化”是指年长的需要向年轻的请教，到了今天的信息社会，科技高度发达，年轻人比老年人思维更敏捷，接受新事物能力更强，文化传播发生了反转，由后辈向前辈传播。今天中国的乡土社会是典型的“后喻文化”时代，年轻人正在发挥着主导作用。面对瞬息万变的电子技术，老人回家问儿子、孙子的事经常发生。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年轻人利用电商平台，嫁接各种服务于乡村的资源，促使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高度融合发展。以何种举措应对“后喻文化”是我国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关键。

八、社会价值由一元性向多元性转变

随着中国乡土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社会价值观愈来愈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经济社会转型阶段，价值多元是客观现实，但价值观多元化容易产生价值观紊乱，并且导致种种社会乱象。社会对此现象有的容忍、默许，有的麻木不仁。本来很简单的事情，因为是非观念不清、说法不一，造成认知上的紊乱。价值观

多元是对的，但是必须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防止价值观走偏。当价值观不再紊乱，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被普遍接受的时候，一个价值观多元的时代才具有真正的价值。

九、社会行为由规范性向失范性转变

中国传统的乡土社会，世世代代聚族而居，讲究合乎礼治的行为规范，村落内部形成人们普遍认同并共同遵守的乡规民约。在人口大流动、物欲大泛滥、文化大冲撞的背景下，乡土社会的社会行为由规范性向失范性转变。这种失范性是指乡土社会中存在着许多不正常的现象，包括敬畏感缺失、羞耻感淡薄、潜规则盛行等。当人们把赚钱当文化，把常规（不偷、守时、诚信）当典范，把底线当上线时，社会生态也就遭到了破坏，社会危机便开始孕育。扫黑除恶，扶正祛邪，以现代法理精神重构乡规民约已成当务之急。

十、社会治理由权威性向碎片性转变

在传统村落中，村落的精英分子以身作则，以自身行为和道德风范形成“权威”并影响村落，呈现出很强的凝聚力、吸引力和号召力。城乡二元制度实行以后，农村精英单向流往城市，乡贤文化由盛转衰，近于凋敝，乡土社会的社会治理由权威性向碎片性转变。农村改革 40 年后的今天，资源单向流入城市的时代已告终结，乡村逐步成为人们旅游休闲、养生养老、投资创业、诗意栖居的理想地，应当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治理体系，为推进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注入新活力。如何注入新活力，应当引入离退休的干部职工、新富阶层等力量共同作用，推进乡村振兴。

（作者：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准则》是共产党人的必修功课

——在第二届 2018（河北）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讨会上报告

卢继传

内容提要：

《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举办研讨会的指导思想。此报告回答以下几个问题：

- 1. 为什么在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回答是，在于解决党内存在的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等突出问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
- 2. 在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有哪些关键内容和要求？回答是，一是遵循党章开展党内政治生活。二是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坚持党的方针、路线。三是党内绝不允

许存在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组织和特殊党员，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坚决同一切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守纪律、守规矩才不会犯错误。

3. 此报告正面阐明，遵循准则，学习准则，贯彻准则，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这需要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好党内政治文化建设，强化教育引导、思想引领，以德育人，以文化人，养成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以党章修炼人生，以优秀共产党员为标杆，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坚定“四个自信”，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许党报国。中国共产党员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党内政治生活建设的使命和目的是引导共产党员和党员干部都成为一种高尚的人、有思想觉悟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同志：

大家上午好！

金秋时节，河北大地洋溢着改革 40 年收获，企业转型升级的喜悦。与会者将实地感受到中国生机勃勃，而深受鼓舞。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廉政研究中心在具有革命传统的石家庄市举行第二届 2018（河北）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研讨会，是政治生活的一件大事，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大会邀请了对党的建设有深刻体会的德高望重的领导和专家包括高校的教授亲临大会指导，将使本届研讨会更有思想深度，好的效果。我们再一次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我讲话的题目《准则》是共产党人的必修课，讲 4 个问题供与会领导、同志参考。

一、关于举办研讨会的目的

党中央一直重视党的政治思想建设。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会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简称《准则》）颁布施行以来，对于健全党内民主，维护党的集中统一、严肃党的纪律、促进党的团结，实现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的高度认同，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准则》是我们举办本届研讨会的指导思想，因而大会的主题是学习、贯彻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推动党内政治文化建设。我们要把研讨会开成一个分享和交流，建设党内政治生活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的经验和体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思想引领的互动论坛，大家都受到启发，进一步明确《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是在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根本遵循。这是其一。

其二，大家要深刻认识到，全党推动党内政治生活和党内监督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对于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提高党的建设科学水平，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对更好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将

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本届研讨会将围绕这两点指导思想开展专题报告、交流、研讨，大家思想互相交汇、融合，认识得到提升，严格以《准则》作为共产党员的行为规范。

二、为什么在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

习近平同志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我们认为，在新的形势下，切实把党建设好、管理好，旨在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行水平，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党中央制定了准则，着眼于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相结合的一个重要安排。这体现德治与法制相结合的管理方式。

（一）思想建党面临哪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呢？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全面从严治党紧紧抓在手上，采取一系列新的举措加大管党治党力度，坚持正风肃纪、标本兼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层层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着力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党内政治生活出现许多新气象，党内政治生态明显好转，全党全社会高度认同。

《准则》指出，在长期实践中，党内政治生活状况总体是好的，但一个时期以来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是：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一些党员、干部党的观念淡漠、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一些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不严格执行党章，漠视政治纪律、无视组织原则。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庸懒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

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目前，我们的干部队伍中，庸懒无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已有抬头之势。事实上，反腐败的斗争仍然很严峻，群众反映强烈。

（二）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必须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生态

上述存在的问题，严重侵蚀党的思想道德基础，严重破坏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严重损害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严重影响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像周永康、薄熙来、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等人严重违纪违法案件，不仅暴露出他们在经济上存在严重问题，而且暴露出他们在政治上也存在严重问题，教训十分深刻。这就使党中央认识到，要解决党内存在的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把党的思想政治建设摆在首位，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习近平同志严肃地指出：“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政治生态污浊，从政环境就恶劣；政治生态清明，从政环境就优良。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一旦出现问题，再想恢复就要付出很大代价。”

由此可见，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党中央制定一个新形势下党的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时机成熟、条件具备，要求迫切，意义重大。

三、在新形势下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有哪些关键内容和要求？

（一）遵循党章开展党内政治生活

《准则》明确指出，必须以党章的根本遵循，着力增强党的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时代性、原则性、战斗性、增强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和统一，努力在全党形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增强党内政治生活的政治性、战斗性、原则性的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关键是高级干部要带头遵守党章。《准则》强调，高级干部特别是中央领导层组成人员必须以身作则，模范遵守党章党规，严守党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坚持率先垂范、以上率下，为全党全社会做出示范。

（二）《准则》对各级党员干部、领导干部提出以下要求，实现这些要求，是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目的

1. 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根本保证。全党必须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

第一，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思想布局（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提高质量和效益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

第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矢志不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坚持改革开放。这是党保持先进性的保证。新形势下，党中央实施全面深化改革，是为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

坚持实施对外开放作为基本国策，旨在不能安于现状，墨守成规，勇于自我革命、勇于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和其他各方面创新。

2. 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这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目的。为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必须做到：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首先是坚持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全党必须牢固树立四个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自觉服从党中央领导。

第二，全党必须自觉防止和反对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本位主义。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决不允许自行其是、各自为政，绝不允许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口是心非、阳奉阴违。

3. 严明党的政治纪律。

共产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遵守、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这是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基本观点。马克思在1859年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指出：“我们现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列宁指出，党不仅是工人阶级有先进觉悟的部队，同时是工人阶级有组织的部队，党员必须遵守党的纪律。

现在，我们党已拥有8000多万党员。全党能否认真遵守、执行和维护党的纪律，直接关系到党的团结统一，关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关系党的凝集力、创造力、战斗力的提高，关系党的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倘若没有严明的纪律，我们党不成其党，也没有政治优势可言。

坚决惩治和有效预防腐败，尤其需要严格的党纪。腐败现象既是对国家法律法规的践踏，也是对党的纪律的藐视。

纪律严明是全党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步调一致前进的保障。这是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内容。

第一，遵守党的政治纪律是遵守党的纪律的基础。

全体党员特别高级干部必须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严格执行《准则》的规定。

一是，党员不准散布违背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不准公开发表违背党中央决定的言论，不准泄露党和国家秘密，不准参与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不准制造、传播政治谣言及丑化党和国家形象的言论等。

二是，党员不准搞封建迷信，不准参与邪教、不准纵容和支持宗教极端势力、民族分裂势力、暴力恐怖势力及其活动。

三是，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不准在党内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严禁在党内拉私人关系、培植个人势力，结成利益集团。

四是，党内不准搞吹吹拍拍、阿谀奉承，尤其要反对搞两面派，反对做“两面人”，反对弄虚作假。

五是，全党必须坚决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以身作则。反对形式主义，重在解决作风漂浮、工作不实，文山会海、表面文章，贪图虚名、弄虚作假等问题。反对官僚主义，重在解决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消极应付、推诿扯皮、作风霸道、迷恋特权等问题。反对享乐主义，重在解决追名逐利、贪图享受，讲究排场、玩物丧志等问题。反对奢靡之风，重在解决铺张浪费、挥霍无度，骄奢淫逸、腐化堕落等问题。坚持抓常、抓细、抓长，特别是要防范和查处各种隐性、变异的‘四风’问题，把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常态化、长效化。

共产党员对党忠诚老实、光明磊落，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这是共产党员的特征，也是本分。

《准则》强调，党内决不允许存在不受纪律约束的特殊组织和特殊党员。每一个党员对党的纪律都要存心敬畏、严格遵守，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违反纪律。

古人云，“畏则不敢肆而德以成，无畏则从其所欲而及于祸。”心中有戒，才能行之有界。一名“落马”

官员忏悔道，纪律规矩就像道路的指路标，任何人都不能偏离，如果偏了，就要走歪了。这样的教训，何其深刻！事实告诉我们，守纪律，才不会犯错误；从政之路才能越走越稳。这条从政大路是，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第二，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要坚决同一切违反党的纪律的行为作斗争。

这关系到能否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保障党员权利、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正确选人用人等。这是对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严峻考验。

为什么说是严峻考验？这里涉及诬告、陷害、打击报复、司法不公正的问题。这是现实存在的。我们党内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是严重存在的；党员举报不法官员，受到陷害、打击的事例也是常有的事，即使纪检、监察、司法机关办案不公、违纪违法、屡次出现冤案的事例也是常有发生。

共产党员理应坚持原则，勇于斗争，与坏人坏事作斗争，但风险很大，谁来保护？因此，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是有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全党必须严格执行准则的要求：

“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形成有权必有责、用权必担责、滥权必追责的制度安排。实行权力清单制度，公开权力运行过程和结果，健全不当用权问责机制，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样的笼子权力是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所期盼的，也只有用法治建设，杜绝徇私枉法，才能使全体党员和广大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更深刻的意义是，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党的领导在制度化、法治化轨道上，全面依法治国的目标可期。用依法治国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民族复兴将能在依法护航下阔步向前。

四、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准则》指出：“建设廉洁政治、坚决反对腐败，是加强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要任务。”这个任务的实质是，保持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

（一）以党章修炼人生

所谓人生，以思想家孔子之言，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为人民做有意义的事，他称的人生为“仁人”。孔子为人生做了简明的注释。党章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为共产党人、为人民、为国家做贡献提供方向。党章是共产党人的信仰。

马克思是一个什么样的人？1867年4月30日，他在致迈耶尔的信中写道：“我一直在坟墓的边缘徘徊。因此，我不得不利用我还能工作的每时每刻来完成我的著作，为了它，我已经牺牲我的健康、幸福和家庭。”一个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人，一个在《资本论》中周密论证剥夺者必将被剥夺的人，一个率领劳苦大众向现存制度发起凌厉攻势的人，不可能在资产阶级一统天下的社会里顺风顺水，安稳度日。不当顺民，必逆境；不愿顺从，比遭厄运——这就是人们在哪个标榜“自由”、“平等”、“博爱”

的社会里面面临的选择。马克思作为劳苦大众的代言人，他向统治阶级宣战。正因如此：马克思就成了“最遭嫉恨和最受污蔑的人”，他所面临的艰险比常人更加严酷。然而，面临如此多的迫害和困境，丝毫没有改变马克思的初心，他用铿锵有力的语言向世界宣布：“我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赚钱的机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创始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思想家的献身精神、坚定立场、崇高信念的人生境界，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风范。

中国共产党章程第一章第二条规定：“中国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牺牲个人的一切，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中国共产党员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除了法律和政策规定范围内的个人利益和工作职权以外，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

党章第三条明确规定党员必须履行的义务，其中规定：“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做贡献。”

保持共产党人的本色，就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为了保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一切困难和危险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

据党史记载，中国共产党第一位女党员缪伯英同志临终时从容地说，“既以身许党，应为党的事业牺牲。”近百年来，无数共产党人以汗水、以鲜血、以生命践行着自己的誓言，他们让人相信，“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是共产党人的信仰和力量。

（二）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行为尺度，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队，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

1. 切实做好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第一，重点内容。《准则》明确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必须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经得起权力、金钱、美色考验，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为人民服务。

《准则》明确要求我们共产党人发扬社会主义新风尚，带头实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主义荣辱观，提倡社会主义道德，继承和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理论联系实际、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讲修善、讲道德、讲诚信、讲廉耻，养成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这就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和重要内容。

第二，重中之重。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学习是进步的阶梯。我们广大党员干部要学习和遵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强化教育引导，思想引领，以文化人，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具有强大凝集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提高广大党员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化素养，培育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是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的四个自信。

广大党员干部要按照“三严三实”的要求，增强坚守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自觉性、坚定性，坚定对党和人民的忠诚，确保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因此，党员干部要把“三严三实”作为思想守则、价值追求和人生信条，真正做到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知行合一。

第三，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科学真理，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坚持不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1938年10月14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的重要文章，号召全党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他精辟地指出：“如果我们党有一百个至二百个系统地而不是零碎地、实际地而不是空洞地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地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伟大创造。正是这一伟大创造，历史性地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如何接中国地气、成功指导中国革命的问题。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浴血奋战，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站起来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下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推进社会主义建设，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密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以全新的视野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进行艰辛理论探索，取得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创造。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我们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责任担当，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我们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凝聚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磅礴伟力。

第四，以文化人。这就要大兴文化，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当今，中国人对文化的需求，主要是一种对素质、道德、智慧和精神的需求，是走向现代文明的一种标志。

对于以文化人的重要性，习近平同志多次指出，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中培养和形成的传统道德规范，是

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长河中能够生生不息、不断壮大的重要支撑力量。这就是说，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发展壮大最基本的文化基因，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标识。

因此，全党要大力传承发展中华传统美德，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更好地唤起人们内心善良的道德意愿和道德情感，才能有效地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道德失范和诚信缺失等问题。

什么是以文化人呢？中国的经典《周易》中有一句名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应当说，这句名言精辟地概括了文化内涵和文化的重要力量。所谓以文化人，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用文化教育人、熏陶人、感染人，让文化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人的思想意识和言行举止，从而提升人的思想觉悟、道德修养、精神境界和综合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以文化人是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定》所强调的关于文化发展的根本目的和正确方向。

2. 什么是一种高尚的人、有思想觉悟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呢？

这是毛泽东主席对共产党员的要求，也是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目的。也就是说，共产党员是一种高尚的人、有思想觉悟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

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纪念白求恩》一文，做了精辟的回答。共产党人读了这篇文章之后，一定会受到深刻的教育。白求恩是加拿大共产党员。他五十多岁时，为了帮助中国抗日战争，受加拿大共产党和美国共产党的派遣，1938年不远万里来到中国。1939年11月12日，在一次为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受到感染，不幸在河北省唐县逝世。一个外国人毫不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毛泽东指出，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

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不是真正的共产党员。他如此说道，不少的人对工作不负责任，拈轻怕重，把重担子推给人家，自己挑轻的。出了一点力就觉得了不起，喜欢自吹，生怕人家不知道。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他说，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这些宝贵的遗训仍然有现实意义。今天，不是有人讲条件、讲回报、讲利益吗？但更多的党员干部讲奉献、讲担当、讲品格。这值得广大党员反思、选择。

毛泽东号召每一个共产党员，一定要学习白求恩同志的这种共产主义者的精神。他诚挚地如此说：“现在大家纪念他，可见他的精神感人至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有这种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有思想觉悟的人、有道德的人、脱离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今天，白求恩仍然是我们共产党人学习的榜样。

3. 共产党员要担当国家的先锋。

2018年9月27日，中共中央决定，追授黄群、宋月才、姜开斌、王继才四位同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

第一，他们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

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六〇研究所党员干部黄群、宋月才、姜开斌同志面对台风巨浪，挺身而出，为保护国家重点试验平台壮烈牺牲。

《决定》指出，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共产党员对党忠诚、恪尽职守、不怕牺牲的优秀品格，用宝贵生命践行了共产党员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初心和誓言，他们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

王继才同志 32 年如一日，他和妻子以海岛为家，与艰苦为伴。2018 年 7 月 27 日，他在执勤期间突发疾病去世，年仅 58 岁。

《决定》指出，王继才同志守岛卫国，用无怨无悔的坚守和付出，在平凡的岗位上书写不平凡的人生华章。我们要大力倡导这种爱国奉献精神，使之成为新时代奋斗者的价值追求。

第二，向英雄们学习什么？

英雄已逝，精神长存。全党、全国人民永远记住他们。习近平总书记闻讯后作出重要指示，赞扬他们是“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勉励广大党员干部以他们为榜样，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许党报国。”

习近平同志精辟地指出：“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这是中国革命的概述。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在这个中华民族的历史演变中出现了一批又一批优秀人物。从革命年代的“人民英雄”，到建设岁月的“建设标兵”，再到“改革闯将”。回首我们党 97 年来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正是有一批又一批优秀共产党员的涌现，以他们的行动感召亿万人民创造一个又一个的人间奇迹。

今天，实现党的十九大描绘的宏伟目标，我们国家更需要优秀共产党员以优秀共产党员为标杆，担当国家的先锋。

优秀共产党员要相应党中央的号召，向黄群、宋月才、姜开斌、王继才学习，学习他们信仰坚定、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恪尽职守、担当有为的敬业精神，甘于奉献、勇于牺牲的崇高境界，淡泊名利、清廉自守的道德情操，使之内化为精神操守，外化为行动力量，争当先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伟大的时代需要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动伟大的事业。伟大的事业需要优秀共产党员担当。无数先贤英烈，铸就民族复兴征程的闪亮灯塔，共产党员要始终坚定理想信念，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许党报国。这不只是入党时宣读的誓词，更是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信仰与力量。

同志们，新时代的英雄史诗，让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来书写吧！

（作者：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2018 年 10 月 10 日）

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与创新：1978-2018

孔祥智

改革开放 40 年来，农业、农村发展和农民生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背后的原因当然很多，其中，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发展及其在形式上的不断创新，是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之一，也是中国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重要载体。本文拟在回顾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40 年变迁历程的基础上，讨论实践中创新的各类形式及其与标准合作社之间的关系。最后，指出中国农民合作社演变的方向，提出对策建议。

一、发展历程回顾

合作经济组织的产生和发展，是农民适应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产物，其基础性因素是农民与其最基本生产资料——土地联系紧密的程度。本文按照农民与土地联结的紧密程度以及相关法律出台的情况，把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分为三大阶段。

第一阶段：1978-1993 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农民名义上有了生产经营自主权，但大部分地区对承包土地频繁调整，而且在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统购、派购制度下，国家通过村级组织牢牢控制农民对土地的使用，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的供给。即使在 1985 年取消统购派购制度以后，又很快以“国家定购”制度再次加强了对粮食生产的控制，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很小，合作经济组织的发育也处于初期阶段。

其实，广大农民对于合作的需求是在“分”——土地承包时就出现了。1984 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了发展合作经济组织问题：“为了完善统一经营和分散经营相结合的体制，一般应设置以土地公有为基础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这种组织，可以叫农业合作社、经济联合社或群众选定的其他名称；可以以村（大队或联队）为范围设置，也可以以生产队为单位设置；可以同村民委员会分立，也可以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农民还可不受地区限制，自愿参加或组成不同形式、不同规模的各种专业合作经济组织。”这一政策对于后来各具特色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文件所说的“地区性合作经济组织”，就是后来发展起来的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而“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则主要发展成为农民专业合作社。

早在 1970 年代末期，安徽省一些地方的农机手就主动联合起来，成立了松散的农机联合体。1980 年代，一些地区的农民开始发展较大规模养鸡、养猪、养兔等产业，促进了畜牧业的发展。为了满足农民之间互相学习技术的需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等合作组织开始发育，据统计，截至 1998 年，中国共有各类农村专业技术学会 12 万个，会员农户 620 余万个，占全国农户总数的 3.5%。从服务内容看，从事技术交流、技术培训、技术指导和传播技术信息的协会占 53%，从事良种推广、生产资料联合采购以及其他产前、产中、产后服务的占 38%；甚至还有 9% 的协会兴办了科研或经济实体，有的还对初级农产品实行储藏运销和加工增值，已经接近于当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1993 年中共中央 11 号文件指出：“农村各类民办的专业技术协会（研究会），

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一支新生力量。”

第二阶段：1993-2007 年。1992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 12 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 年 11 月 5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当前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提出：“为了稳定土地承包关系，鼓励农民增加投入，提高土地的生产率，在原定的耕地承包期到期之后，再延长三十年不变。”“提倡在承包期内实行‘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极大地调动了农民在承包地上进行投入的积极性。加上农业部门在 1988 年开始实施“菜篮子工程”，到了 1990 年代，肉、蛋、奶、果、菜等各种农产品的供给都逐渐充足，并开始出现区域性、季节性过剩。1998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对当前农业经济形势作出了“总量平衡，丰年有余”的判断。在这种形势下，农民为了应对市场，开始更加主动、自觉地联合起来，各种形式的合作组织快速发展，当时称为“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部分合作经济组织开始延长产业链，从事农产品加工业。据统计，1998 年，拥有加工业务的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已占 2.4%。“农民专业合作社”名称也在这一阶段开始出现，浙江等发达地区开始推动合作社的发展，有些在民政部门注册，有的在工商部门注册。当时农业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出台前，全国共有比较规范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15 万家。

进入新世纪以后，农民专业合作社在农业生产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2000 年到 2002 年，约有 200 多名全国人大代表提交议案，要求制定专门法律促进并规范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2006 年 10 月 31 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了《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并于 200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三阶段：2007 年至今。把 2007 年作为这一阶段的起点，首先当然因为《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于这一年实施，开始了中国合作社发展的新纪元。从此，农民合作社有了合法身份，能够作为市场主体与其他类型经济实体进行交易，开展相关经济活动。其次，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 2007 年 3 月 16 日通过了《物权法》，并于 2007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土地承包权由一直以来的债权转化为物权，成为农民的财产权，这对于保护农民的合法财产权益，促进合作社发展起到了基础性作用。再次，2008 年 10 月，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提出：“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这就使有意转出、转入土地的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土地流转比例开始大幅度提高，各种类型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始迅速发展。根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2007 年底，全国在工商系统登记的农民专业合作社 2.64 万家，截至 2018 年 6 月底，达到了 210.2 万家，提高了近 80 倍。根据农业部门的数据，目前，48.3% 的农户都加入了各类合作社，合作社自身盈利能力和带动农户能力都有了很大提高。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合作社已经发展成为带动农户进入市场的基本主体、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新型实体和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的有效载体。

应该看到，与经典的罗虚代尔先锋社相比，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发展一开始就呈现出多样性的特点。罗虚代尔式合作社以成员同质性为主要特征，这为成员之间的互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而中国农民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不断分化，既有专业大户，又有微型家庭农场，更多的是兼业小农户，这些主体结合在一起，使得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异质性的特点十分明显。从领办主体看，既有大户领办，又有村委会领办，还有基层政府机构（如乡镇畜牧站、科技站等）领办，这种多样性特征正是中国农业发展多样化模式的体现，也是中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显著特点。这种异质性土地反映在盈余分配上，就是一些合作社突破了《农民专业合作

社法》规定的交易额至少占 60% 的界限，或者变相突破了这一界限，以至于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大农吃小农”现象。但实际上反映了经济组织按要素贡献分配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合理的。而且从实际效果看，小农户也能够从中获益，也是满意的。一些国外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加入合作社对于提高农户福利具有正向影响。这说明中国农民合作社在一开始就遵循实用主义原则，并没有严格遵循某种理念甚至法律（法律是根据理念制定的），农民只讲求实际效果。

回顾 40 年来的历程，可以看出，合作经济组织是中国农民继家庭联产承包制之后的又一伟大创造。尽管“分”是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期、80 年代初期绝大多数中国农民的迫切愿望，但一旦实现了“分”，“统”的需求马上就产生，各种各样“统”的形式很快出现，如帮工、代工、换工，各种联合体（包括前述农机手的联合体），创造了各种不同类型、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合作形式。这些形式在以后的发展中有的逐渐消失，有的则延续下来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意思的是，中国农民在进行合作和创造合作组织形式时，并没有一个现成的样板可以参照，但其基本内核却接近于国际公认的标准合作社，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反过来也说明，拿着一个国际标准来硬套中国农民合作社，并把不符合标准部分说成“不规范”“，甚至是“假合作社”，本身就是不公平、不客观的。

二、中国农民合作社在发展中的创新

世界上公认的第一个标准合作社就是成立于 1844 年的罗虚代尔先锋社。这个由 28 个纺织工人组成的合作社，成立之初就制定了一套切实可行、公平合理的办社原则，即：入社自愿；一人一票；现金交易；按市价售货；如实介绍商品，不缺斤少两；按业务交易量分配盈余；重视对社员的教育；政治和宗教严守中立。后人简称为“罗虚代尔原则”。1895 年，国际合作社联盟成立，就确定罗虚代尔原则为国际合作社运动原则。尽管后来国际合作社联盟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多次修改其原则，但罗虚代尔原则所蕴含的基本精神并没有根本，即民主控制、资本报酬有限、按惠顾额分配盈余。中国的合作社原则体现在《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是罗虚代尔原则的具体化和国别化。但是，中国是在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对全国农业有了全面布局的基础上才开始发展合作社的；对包括承包土地在内的农民财产权益的保护也是逐步强化的；更为重要的是，改革开放 40 年来，中国农民的分化水平和兼业化水平都大大高于发达国家。这些因素都决定了中国农民合作社的发展路径不可能和发达国家亦步亦趋，而是必然有自己独特的形式和特点。一些学者把这一现象称为“异化”，而本文认为，现实中，无论哪种类型合作社，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劳动生产率或土地生产率的提高，促进了现代农业发展，都是中国农民对世界合作社运动的贡献。因此，本文认为，这些丰富多彩的创新实践形式正是中国合作社的生命力所在。

（一）农机合作社

典型的农机合作社是农机手为了更好地为客户服务而组建的合作社。一般而言，一个农机手不可能购买一个系列中的各种农机，而实践中的需求则呈多样性，这就促使农机手联合起来，共同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尤其是尤其是 1990 年代后期以来山东、河南一带跨区作业的农机越来越多，地方政府农机部门为了便于管理，也要求农机手成立合作社。从调研的结果看，农机合作社入股的形式主要是带车入社，也有的以资金入股。合作社内的农机手有的自有农机，有的则是使用合作社的农机。带机如社的成员，其收入按照自己作业的数量来计算；而没有带机入社的农机手，在耕作的时候则以工资的方式结算。一些农机合作社在 2008 年以后的土地流转大潮中开始转入土地，进行集约经营，这就不单纯提供服务了。经营土地获得的盈余主要按照成员

在转入土地时投入的资金以及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劳动进行分配。实践中多种投入和多种分配形式交织在一起，可能相当复杂。

在浙江一些土地流转比例较高的地区，农机大户、种粮大户、家庭农场等联合起来组建农机合作社，这样的组合，农机手有了稳定的作业来源，不再需要到处找活干；种粮大户和家庭农场则不需要自己购买农机，降低了固定费用。这种类型的合作社，合作的环节主要是农机作业，实际上就是支付农机作业费用，或者以作业费用为基础。较为深入的合作则是合作社购买农机，加入农机手带机入社的农机，共同组建农机服务队，除了为本合作社成员就服务外，还可以对外服务。从我们调研的情况看，浙江等地农机合作社主要提供三种模式的服务：一是提供“菜单式”服务。合作社统一制定机耕、机插、植保、机收等作业服务标准，以“菜单”的形式提供农户自主选择服务项目，签订作业服务合同，合作社统一调度机手、机具，及时提供作业服务，作业完成并经农户验收后，按作业量结算服务费。二是托管土地提供“托管式”服务。一些常年在外打工或经商办企业的农户，将承包田全年或某一季托管给农机合作社，合作社根据托管协议开展代耕、代种、代管、代收、代烘等作业服务，收获的粮食作物归农户所有，合作社获得以粮食或现金结算的托管费。三是流转土地提供“全程化”服务。农机合作社利用技术、装备、资金等优势，通过土地流转发展规模经营，推行全程机械化作业，在完成承包田仍有余力的情况下，适时组织机具为周边农户提供作业服务。

总的来看，各地农机合作社的组建模式非常复杂，其收入一般来自两部分：一是农业服务收入；二是流转土地经营后的农产品销售收入。支出包括三个部分：一是流转土地支付的地租；二是支付给农机手的工资（由于农机属于合作社社员集体所有，因而有的合作社支付农机手固定工资或从农机手的服务收益中提成作为合作社收益；有的合作社管理人员不领取工资）；三是其他经营支出，如农机维护、燃油费，农业经营支出等。总收入与总支出之差为合作社盈余。合作社的盈余分配为两个部分：一是提取公积金；二是剩余的部分按照社员入股股金进行分配。

与标准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相比较，农机合作社更强调入社的股份（包括农机折价形成的股份），这是由于农机的价值较大，同时合作社股份构成较为复杂（农机、土地、资金等）所造成的，但在管理方式上依然强调民主，强调民办、民管、民受益，是中国农民对于世界合作社运动的重要贡献。

（二）土地股份合作社

顾名思义，土地股份合作社就是成员以承包土地折价入股为主组建的合作社。这里之所以说“为主”，是因为一个经营实体仅有土地是无法开展经营活动的，必须有合作社自购或租赁的劳动工具、生产资料等与之相匹配，而无论自购还是租赁都需要一定的资金，则需要由全体或部分成员以资金入股合作社。因此，在现实中，所有土地股份合作社都是资金和土地的混合股份，并且后者往往以当地土地流转价格折价入股。而以资金入股合作社的往往是少数核心成员。从决策方式看，一般采取成员大会或者成员代表大会的方式决定重大事项。从分配方式看，由于不存在交易量，所以一般采取按股分红的方式。当然，现实中的土地股份合作社比较复杂，一是农民自愿以土地入股组建合作社；二是由村委会主导，把农户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股权化，组建的土地股份合作社有的目的经过统一整理后整体流转，有的是统一经营（或者二次分包）高效农业项目；三是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过程中将村集体土地与集体经营性资产一起折股量化，明确每个社员的股份，这类合作社有的也冠以“土地股份”的名称，但实质是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我们将在下文讨论，本部分重点前两类土地股份合作社。

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所界定的标准合作社相比，土地股份合作社具有以下特点：第一，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三条的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以其成员为主要服务对象，开展农业生产资料的购买、使用，农产品的生产、销售、加工、运输、贮藏等方面的服务性业务，目的是为全体成员提供自助性质的服务，即通常所说的“生产在家，服务在社”。而在土地股份合作社中，成员以承包土地折价入股后就不再独立从事生产经营活动，即使参与合作社的经营行为也是以雇员的身份。这样，合作社就不是对成员的经营提供具体服务，而是对成员承包的土地提供统一经营或流转服务，二者是有本质的区别的。第二，《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第四条规定“入社自愿、退社自由”，但现实中第二类土地股份合作社一般是发达地区的经济强村，由村委会牵头组建，所有村民以承包地入股，尽管也强调入社自愿、退社自由，实际上村民选择的余地较小。因此，这种类型的土地股份合作社与标准合作社差距较大。第三，从分配方式上看，一种是按承包地流转价格折合的资金分配。入股土地折合的资金和现金入股结合在一起，构成了合作社的总股金。因此，土地入股相当于资金入股。二是保底分红，即承包地按当地土地流转价格折价，年底先按照这个价格给成员保底分红，然后再进行其他方面的分红。如果入股合作社盈余较多，则成员在保底分红的基础上还可以多分一部分。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看，保底分红背离了“风险共担”的基本要求，因而与标准的合作社差距较大。三是把承包地入股以流转价格（或经过商定后的其他价格）作为交易量分配盈余，实际上拓展了交易量的范畴，是中国农民对合作社理论的重大贡献。

把承包土地按一定价格折算后入股合作社并作为交易量参与分配，始之于黑龙江省克山县仁发农机合作社（以下简称“仁发合作社”）。该合作社虽然在名称上冠以“农机”，但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类型的土地股份合作社。该合作社成立于2009年，当时7个成员出资850万元购买农机，得到国家财政补贴（农机购置补贴）1234万元，合作社总资产2084万元。2010年以代耕代种等形式经营一年并亏损后，2011年开始吸收307户农民以土地入股，加上原来7个创始人，合作社经营的土地达到1.5万亩，当年盈余1342.2万元；2012年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到1222户，合作社经营的土地面积增加到3万亩，总盈余增加到2758万元。按照与土地入股成员的协议，2011、2012两个年度的分配方式是：入股土地以每亩350元的价格保底分红，剩余部分以原7个创始成员的股金加上国家财政补贴平均量化到每个成员部分作为投资参与分配；2013年起合作社成员主动要求取消保底分红，所有成员共同承担经营风险。经研究，合作社把土地入股部分按交易量参与盈余分配，投资股金（包括后来的追加投资）加上国家财政补贴平均量化到每个成员部分，以及合作社提取的公积金平均量化到每个成员部分作为投资参与盈余分配。至此，仁发合作社演化为标准的合作社。后来，仁发合作社经验在全省范围内得到了推广，黑龙江省的许多冠以“农机”名称的合作社实际上都是借鉴仁发的经验发展起来的。

（三）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

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是指将农村集体净资产量化到成员后形成的合作经济组织。早在1980年代后期，作为当时中央书记处研究室农村改革试验区的山东省淄博市周村区就试点了农村社区股份制改革，把村集体资产量化到每一位成员，并成立了中国最早的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据农业部门统计，目前全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拥有土地等资源性资产66.9亿亩，各类账面资产2.86万亿元，平均每个村近500万元，东部地区村均上千万元。这些资产是中共十九大提出的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物质基础，也是当前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物质基础。但在集体所有制框架下，名义上人人有份，但实际上归少数人支配，无法调动广大农民

管理、经营这部分集体资产的积极性。因此，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稳步推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意见》，要求从2017年开始，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完成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在此基础上，把农村集体资产的所有权确权到不同层级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集体，并依法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在上述工作的基础上，要求用5年左右的时间有序推进经营性资产股份合作制改革，构建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而从2015年起，农业部门就在全中国29个县（区、市、旗）试点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及农村社区股份制改造工作。

从实践中看，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的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成员同质性。社区股份合作社的成员和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是重合的，强调人人有份，成员按份所有。这样，每个成员的股份构成比较接近，即使在运行转让的合作社，为了防止一股独大，大部分合作社都设计了单个成员持股的上限。在这样的制度框架下，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成为典型的同质性合作社，成员之间的地位差距很小。第二，社区封闭性。股份合作社的成员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二者完全重合，即使出现股权转让的情况，也局限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不存在组织外部成员。现实中，这种封闭性特征已经影响到了合作社的运行效率，一些资金实力较雄厚的合作社已经开始聘请组织外部的职业经理人承担合作社经营管理工作，但少数“外部人”如何与“内部人”精诚合作，依然是需要长时间磨合的问题。第三，决策民主性。在持股均衡的前提下，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在决策时能够真正实现“一人一票”，这是当前一般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所不具备的。第四，分配均衡性。与专业合作社不同，社区股份合作社由于没有交易量，所以完全按照股份进行分配，由于每个成员的持股份额比较接近，所以盈余分配也比较均衡。

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的上述特征是由集体所有制性质所决定的，尽管不能完全等同于专业合作社，但基本运行规则依然接近于专业合作社，或者说是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基本精神所设计的。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也要求新成立的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到工商部门按照《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的要求进行登记，当然具有削足适履之嫌，但应该看到，社区股份合作社除了成员的封闭性，完全按股份分配盈余等特点外，在其他方面还是和标准的专业合作社比较接近的。

（四）企业领办合作社

企业领办合作社是中国农业领域的一个特殊现象。1990年代初期，山东省潍坊市在全市范围推行“贸工农一体化”的做法，后被总结为农业产业化，1990年代中后期由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农业产业化政策的核心是“公司+农户”，即引进或发育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用以带动基地农户发展商品农产品生产。这一政策对农业生产的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利益不一致而引发的企业和农户之间的矛盾和违约现象很难解决，于是，一些企业在新世纪以后就开始领办合作社。这样的合作社，早期可能仅仅是企业的一个部门，甚至隶属于原料部门，但长期以来，一直在协调二者的利益关系上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苑鹏认为，企业与农户之间通过共同建立合作社，将原本属于外部交易关系内部化，有利于双方建立起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机制，并加大了双方的违约成本，减少了违约现象的发生，并有利于帮助农户建立起稳定的农产品市场营销渠道。在实践中，一些企业领办的合作社甚至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合作社。无论如何，企业领办合作社具有一定合作的性质，是在龙头企业大规模进入农业领域的前提下，中国企业家和农民共同推进的制度创新，也是中国对世界合作社运动的重要贡献。更为重要的是，一些企业在发展过程中为了更好地与农户建立稳定的产销关系，有的吸收农民入股，有的投资兴建种植、养殖终端后以租赁等形式提供

给农民使用，有的在产品售后给农民二次分红等等，在一定程度、一定层次上向着合作社化的方向演进。这种现象体现了企业的专用资产投资到一定程度后，必然要求稳定的原料来源，而与农户之间结成紧密的利益关系有利于企业长远发展。现实中广东的温氏集团、山东的新希望六合集团都具有这一特点。应该说，这样的发展趋势是中国企业家和农民的伟大创造，符合世界农业发展的大方向，符合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大方向。

三、供销合作社的改革和发展

供销合作社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探索的“三大合作”（供销合作、生产合作、信用合作）中最早成立的合作经济组织。早在1950年7月就成立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1954年7月改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手工业生产合作分出）。成立至今，与原商业部三合三分，1995年第三次从原商业部分出至今。改革开放40年来，供销合作社经历了几次重大改革，都是围绕着如何恢复“三性”而进行的。分别是：第一，1981年12月18日，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报送了《关于供销合作社改为集体所有制试点的报告》，提出要有步骤地、自下而上地把供销合作社改为集体所有制，办成农民的商业。第二，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恢复和加强供销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和经营上的灵活性，使它在组织农村经济生活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基层供销社恢复合作商业性质，在自愿原则下扩大吸收生产队和农民入股，经营利润按股金和按交售农副产品数量分红，实行民主管理，把供销社的经营活动同农民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县级供销社改为基层社的联合社；县联社和基层社都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向国家交纳所得税的制度；改革后供销社原有国家职工的一切待遇不变。”第三，1995年2月2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改革的决定》，提出：“以基层社为重点，采取切实有力的政策措施，使供销合作社真正体现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性质，真正实现为农业、农村和农民提供综合服务的宗旨，真正成为加强党和政府与农民密切联系的桥梁和纽带。”第四，2015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的决定》（中发〔2015〕11号），提出了到2020年供销合作社改革的目标，指明了改革的基本原则，包括“坚持为农服务根本宗旨，……做到为农、务农、姓农”，“坚持合作经济基本属性。”为新时期供销合作社的改革明确了方向。

早在2014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批复同意供销合作总社启动河北、浙江、山东、广东四省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试点。2015年，四个试点省根据中发〔2015〕11号文件精神及时调整或重新制定了新的改革方案。四个试点省按照“改造自我、服务农民”的总体要求，贯彻中央11号文件精神，坚持把供销合作社改造成为与农民联结紧密、为农服务功能更完备、市场化运行更高效的合作经济组织体系，成为服务农民生产生活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成为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切实在农业现代化建设中更好发挥作用。截至2016年底，四个试点省的试点任务已经结束，试点成果已在总结后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各省的试点任务不同，但最终都落到两大方面，一是如何把基层社办成真正的合作经济组织，二是如何把供销合作社办成为农民生产生活服务的生力军和综合平台。下面本文以山东省试点的做法及成效进行讨论。

山东省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分为四个层面。第一，村级层面，实施“党建带社建村社共建”，具体做法是：基层社依靠农村基层党组织，紧密结合农村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精准扶贫、经营服务等活动，与村“两委”共建农民合作社、农村综合服务社、农业生产发展项目和干部队伍，促进村集体和农民“双增收”，实现了基层社向农业生产经营和农村生活服务“双覆盖”，使供销社从最基层实现了“姓农”的要求。有了

村社共建，特别是村社共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后续发展起来的农民合作社联合社才成了有本之木，故村社共建是供销社改造自我的源头和基石。其次，在乡镇层面打造实体性合作经济组织。即在村社共建的基础上，依托基层社，以农民合作社为核心成员社，联合本区域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专业大户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组建实体性乡镇农民合作社联合社并在工商部门登记为合作社法人；联合社与县级农业服务公司（县级联合社）协同建设为农服务中心，打造“3公里土地托管服务圈”，基层社、镇级农民合作社联合社、为农服务中心“三位一体”，共同构建了乡镇层面为农服务综合平台。第三，在县级层面，构建县级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在编制部门注册登记为事业法人，并与县级供销社“一套机构、两块牌子”。通过组建县级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在县域范围内形成上下贯通的联合社组织体系和经营服务体系，推动县以下供销社与农民合作社融合发展。总的来看，山东省供销社综合改革的路径是：村级层面上组建合作社（不一定在村域范围内），乡镇和县域层面上构建联合社（两级联合社的性质及功能不一样），县乡两级联合（包括省、市级供销社联合社的资金支持）在乡镇打造为农服务中心，大多依托乡镇级联合社，为域内农民实施土地托管服务。如山东省莒南县建成为农服务中心14处，土地托管面积35万多亩，涵盖小麦、玉米等大田作物和草莓、花生、蔬菜等经济作物。截止到2017年底，山东省土地托管面积达3200多万亩，综合托管率超过20%。通过土地托管，实现了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现代要素对传统农业的改造。土地托管，其实就是社会化服务，有效破解了“谁来种地”的难题，在服务环节上推动了农业规模经营，降低了农业生产成本，实现了农业增效和农民增收，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的重要方式。尤为重要的是，山东省的托管服务已经从大田作物发展到经济作物，从平原发展到丘陵、山区，从种植业发展到养殖业，很多规律性的东西值得总结。

目前，全国共有2.3亿农户，其中2.1亿农业经营户，平均每户承包不到8亩耕地，每个地块不到1亩，是典型的小规模经营农业。从土地流转看，截至2017年底土地流转总面积4.79亿亩，占家庭承包经营总面积的35.1%。通过流转形成30亩以上的大户1052.1万家，其中50亩以上的356.6万家。可见，中国小农户经营的总体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因此，在小农户基础上实现农业现代化，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怎么办的问題，即按照中共十九大的要求，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可见，山东省供销社综合改革所创造的土地托管经验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和极大的推广价值。应该特别引起注意的是，土地托管的基础是合作社的全面发展。截至2018年上半年，山东省共有农民专业合作社19.6万家，占全国的9.3%。因而，农民专业合作社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基础，是农业中的现代企业制度。供销社改革以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为农服务为突破口，找到了中国发展现代农业的薄弱环节，在路径选择上符合中国现代农业的发展方向。尽管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已经达到了210.2万家，但单个合作社的规模较小，只有60人左右，不足以影响市场，对成员的吸引力也不大，已经到了再合作的关键节点。为此，新修改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专设一章规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的组建及运作规则。但如何推进合作社之间的联合与合作，依然是一个有待于突破的重要实践问题。山东省供销社在综合改革过程中依托基层社发展乡镇级联合社，依托县联社发展县级联合社，节约了合作社再合作的交易成本，极具推广价值，是对中国合作社事业的重要贡献。

四、总结和展望

本文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历程，讨论了40年来中国农民在合作经济领域的创新及对世界合作社运动的贡献，总结了供销社改革的过程及进展。本文认为，由于所有制关系的特殊

性，不同地区农业发展的不平衡性，各地区文化和农民的创造性的差异性，加上政府机构（或准政府机构，如供销社）的作用，造成了中国农民合作社实践的丰富多彩。不仅制度上源于罗虚代尔的专业合作社发展呈现多样性，更是分化出诸如农机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企业领办合作社等多种创新类型，包括供销社在改革中发展的专业合作社、乡镇和县级联合社，尽管与《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所规定的合作社有一定的差距，有些的差距还比较大，但在实践中都为农民组织化水平和农民收入的提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都是中国农民基于现实条件所作出的理性选择，具有浓厚的实用主义色彩。这些实践和探索体现了中国农民对世界合作社运动的贡献。当然，现实中的确有一些名不副实的合作社，如一些家庭农场把转入土地的农民作为成员申报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把给予农民的土地流转费用当做分红；一些社会化服务企业把服务对象作为申报组建农民专业合作社，把因大量购买农资而低于市场价的部分作为分红；等等。这些名义上的合作社当然合作的成分都很低，需要主管部门在实践中予以纠正，因而不在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2017年10月，中共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并写进党章，作为中国共产党长期的奋斗目标。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总体要求“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中，产业兴旺是关键，而农业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合作社是基本组织形式。而且，新世纪以来的农业农村发展历程证明，合作社对于其他四项要求也具有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因此，在未来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中，各种类型合作社必然是重要载体。为此，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尽快研究制定《合作社法》，确立合作社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包容上述各种合作社类型。目前，农机合作社、土地股份合作社都在工商管理部门注册，农村社区股份合作社有的在工商部门注册，有的在农业行政管理部门注册，前者注册为合作社法人，后者则不具备经营职能。这种情况说明，目前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无法容纳实践中出现的合作社类型，不能满足广大农民发展合作经济的需要，必须制定一部统一的《合作社法》，对上述各类合作社的运作规则进行具体规定。

第二，准确把握中国合作社的发展方向。目前，全国在工商部门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已达210.2万家，平均每个村3家以上，接近一半的农户都加入了各类合作社。但每个合作社的平均成员数太少，只有60个左右，对市场的影响较小。近年来，已经出现了“从户间合作向社际联合迈进”的趋势，反映了农民对于更高层次合作的客观要求。如前所述，山东省供销社在改革中依托县乡两级供销社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是一种有效的联合社发展模式。其他地区在实践中应该总结出更多模式，借助政府机构（包括准政府机构）的力量，推进合作社之间的联合，尤其是同类合作社之间的联合，对于增进成员福利，提高农业竞争力具有重要作用，应该作为地方政府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工作的重点之一。

第三，不断向更多农民普及合作社文化。更多农民合作意识的增强，对于合作社发展以及合作社之间的再合作会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合作社本身就具有向成员及社区内非成员普及合作社知识，强化合作意识的义务。在罗虚代尔先锋社成立之初确立的八项原则中，“重视对社员的教育”是其中之一。早在1849年，合作社成立了教育委员会，1853年合作社章程规定每年要从盈余中提取2.5%作为教育基金，对社员进行文化、合作思想和道德的教育。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建议大型合作社和联合社从公积金中拿出一部分用于对成员及社区内非成员的教育，增强合作意识，促进合作社进一步发展。

（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党委书记兼副院长；来源：《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是维护农民的土地财产权

郭书田

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延伸与发展，是实现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目标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9月27日，新华社公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全文共11篇，37章，107节，3.5万字，加上《专栏》15篇，1.4万字，共计4.9万字。农业农村部党组撰文《在全面深化改革中推动乡村振兴》，刊于《求是》2018年第20期。这两个文件成为指导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权威性的依据。

在党的十九大闭幕以后，我作为农业战线退休的一名老兵，于2017年11月1日向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要有分阶段、分区域的量化指标，供制定实施规划参考。2018年10月初，《农民日报》记者刘强采访农业系统老干部建言乡村振兴，刊载了我的发言《让振兴成果落在每个农民身上》。10月10日，中央电视台农业频道为纪念农村改革40周年，向我采访的题目中第一题是：为什么说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农民问题？我说，毛泽东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农民问题始终是革命与建设的根本问题”，但落实得不好。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三农”工作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其中农民问题又是关键。因为农业与农村的主体是农民，离开农民，农业与农村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的空中楼阁。在新中国建立以来，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始终是农民的命根子，土地的关键是农民的财产权问题，财产权的要害是在“集体化”中被剥夺，直到今天。回顾历史，在土地改革中农民获得了所有权，这是“私有私营”；在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是“公有私营”；在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与人民公社时期，土地成为“公有公营”；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土地包干到户，这时是新的“公有私营”，即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分离。党的十八大以来，实行土地“三权”（落实集体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分置，将承包权与经营权分离。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实行股份合作以来，各地出现了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股权，农民变股东的“三变”，找到了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有效实现形式，也就是土地由实物形态变为价值形态，落实到农民身上，解决了长期以来集体所有土地农民主体缺位问题。我们认为，在工业化、城镇化加速发展过程中，是以牺牲农民土地权益为代价的。土地城市化了，农民未能市民化，土地农转非的收益被剥夺了。据财政部统计，1999年至2017年的19年中，土地流失了1亿多亩，而土地出让金高达34万亿元，最高的2016年为4.2万亿元，农转非的差价收益成为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农民所得无几。原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承认这里存在“重城轻乡”、“重工轻农”问题。十九大在充分肯定十八大以来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同时，指出存在发展不平衡与不稳定问题。韩长赋部长对记者说，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业与农村发展不充分。也就是说，目前农业仍是短板，农村仍是短腿，农民仍是最大的弱势群体，也是世界最大的弱势群体，中国农民占世界农民总

数的 40%。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不在于人均资源禀赋不足，而根子是长时间形成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以及所产生的利益结构，根深蒂固，也就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体制障碍。在上述两个权威性文件中，城乡居民收入之差比由 2017 年代 2.7:1 到 2022 年缩小为 2.67:1，还高于改革开放前 1978 年 2.5:1 的差比，更高于 1984 年 1.7:1 的差比。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在城市化中，农村土地变为城市用地，起决定性作用的是地方政府而不是市场。政府既垄断一级市场，用行政手段以低价征收农民土地，又经营二级市场，以高价卖给房地产开发商，从中获得巨大的差价收益。这种体制已经延续了 60 多年，到了必须下决心改革的时候了，即转变政府职能，还权于民。放开一级市场，退出二级市场，土地价格由市场根据供需关系确定，差价收益归农民及其合作组织所有。属于公益性用地，由政府买单。这个问题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温家宝同志任总理时，曾对反映这个问题的一份材料上批示：三令五申，收效甚微，触目惊心，后患无穷。在他离任时讲了一句话：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建设用地收益权，是法律赋予农民的权利，任何人不能剥夺。这涉及现行诸多法律问题，包括《农业法》、《土地管理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农民专业合作社法》等，这些有一条固定的说法，即“农村土地除国有外属农民集体所有，由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这是由于当时有些村在实行土地大包干后合作经济组织解体，成为空壳村，加上农民“谈合作色变”的心理，于是加上一句“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由此带来两大后遗症，一是村民委员会设在原生产大队，即行政村，村民小组设在原生产队，即自然村，无形中把核算单位由生产队过渡到生产大队，也就重犯了已经纠正的“穷过渡”错误并更加合法化了（1976 年在农业学大寨中，中央发了一个 49 号文件，提出由生产队向生产大队过渡的指标，已经得到纠正）。二是村民委员会成为土地的发包商，重犯政社不分的错误。因此出现农村集体所有权的主体是村民委员会的说法。这个规定的源头是《农业法》，因此应把几部有此规定的相关法律作统一的修改，彻底改变目前的混乱状态。已经修改的《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与即将修改的《土地管理法》，都未能对此作出纠正。

农民拥有的土地财产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都犯有不同程度侵犯农民土地财产权的错误，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经过 28 年的奋斗，夺取了革命的胜利，农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在新中国建立以后，实行土地改革，农民有了土地财产权。而时隔不久，被无偿“集体化”了，但工业化的原始积累又是采用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政策（斯大林称为“超额税”）由农民无偿提供的。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失误中，农民既是受害者（包括饿死人事件），又是坚持生产为城市居民提供最低必需的粮食，渡过了难关。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创造的土地包干到户、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民主政治建设的村民自治、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以及集体经济组织的股份合作等，对推进中国违背经济规律的体制改革，发挥了领头作用。但是至今农民仍处在弱势状态。诚然，农民是小生产者，要通过合作社的形式让农民组织起来，实现社会化大生产与现代化。土地财产权的主体仍然是农民，绝不能剥夺，不论是有偿或无偿，也不论是暴力或非暴力，都是不允许的。我们长时间以来，把农民视为处于十字路口而产生资本主义的阶级，不断剥夺他们的土地财产权（包括 1972 年修改的人民公社条例时，把宅基地宣布集体所有，现在仍实行“三权”（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分置的办法。小岗村的土地包干到户，解决了经营权的问题，未能够解决所有权问题，最近他们通过实行“三变”（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股权，农民变股东），把土地财产权以价值形态落实到每个农民身上，在产权制度改革上又

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土地财产性分红收入在家庭收入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农业多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增加工资性收入，提升了农业的规模经营与现代化水平，农民的人均纯收入 2 万元以上，超过全国农村平均水平，每年有近百万人次来这里旅游。这充分说明事在人为，关键是以民为本，解放思想，把维护农民权益作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检验乡村振兴有否实际成效的试金石。他们转变了传统观念，由“为民做主”变为“由民做主”，一字之差，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这是切中要害的举措，使农民能够真正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法规司长，高级经济师；2018 年 10 月 25 日）

深入实施乡村战略振兴战略，推动南京市都市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蒋晓平

江苏省南京市紧紧围绕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现代农业建设迈上新台阶这条主线，加快转变农业发展方式，不断深化农村综合改革，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产出高效、产品安全、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功能多元的都市现代农业，取得了明显成效。2017 年南京都市现代农业综合指数位居全国第三，在 15 个副省级城市中名列第一。

一、坚持市场导向，增强农业综合竞争力

以大城市消费需求为导向，持续优化现代农业产业结构和区域布局，加快形成结构合理、保障有力、供给有效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一是稳定粮食生产能力。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实施优质粮食工程，大力推广优新小麦和水稻品种，提高优质品种覆盖率。深入开展粮油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加强防灾减灾、重大病虫害防控能力建设，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实现稳步提升。二是大力发展特色蔬菜园艺。加快建设一流蔬菜园艺业，重点打造“菜篮子”基地 20 万亩，建成省市“菜篮子”生产基地 25 个，带动全市 120 万亩蔬菜种植。推进茶叶、花卉、果品等精品园艺和经济林果标准园建设，实行标准化生产，改进产品质量，促进产业多元化发展。三是加快现代畜牧业建设。优化畜禽养殖结构，着力推进适度规模经营，淘汰散养户，压缩小规模养殖比重，建成部、省级示范场 54 家，生猪大中型规模养殖比重达 76%。四是积极发展现代渔业。优化渔业产业布局，以提升基础设施水平为重点，着力打造一批高集约度、高附加值、高竞争力的规模渔业基地，大力推广“太湖 1 号”青虾、“长江 1 号”河蟹等水产优良品种，全市名特优水产养殖比重达 76.7%。

二、坚持科技兴农，增强农业创新驱动

加快用现代科学技术服务农业，用现代物质装备武装农业，用现代生产方式改造农业。一是加快农业科技创新。发挥南京科技实力雄厚优势，率先在全省成立由南农大、南林大、省农科院等 32 家单位组成的市农

业科技创新联盟，目前联盟成员单位发展到 78 家，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发布科技成果供需信息 687 项，有效对接 200 多项。创新农业科技示范推广方式，积极探索以农业专家、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等多元主体参与，以市场为导向的科技示范推广新模式，全市农业科技贡献率达 67.3%。二是加大农业园区建设。把现代农业园区作为推进现代农业发展的重要载体。2015 年以市为单位成功创建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进一步集聚土地、资金、科技、人才等生产要素，建设了一批规划布局合理、生产要素集聚、产业特色鲜明、经营机制完善、辐射效应明显的现代农业园区。现有市级及以上现代农业园区 41 个，其中国家级 3 个、省级 9 个。三是加强农业物质装备建设。扎实推进新一轮高标准农田建设，提升农田基础设施配套水平，提高农机作业便捷度，全市高标准农田比重超过 60%。加快设施农业转型升级，大力推广设施农业新装备、新技术，全市设施农业比重达 20%。大力推进粮食生产全程机械化、设施农业全面机械化，全市农业机械化水平达 86%。

三、坚持业态培育，增强乡村发展新动能

推动农业三次产业紧密衔接，丰富农业产业内涵，提升农业的价值链，不断增进市民福祉。一是大力发展创意休闲农业。积极发展观光农业、创意农业、体验农业、科普农业、乡村旅游等休闲农业业态，中国·南京农业嘉年华活动影响不断扩大，已连续举办十三届，成为农业农村部重点推荐的全国休闲农业著名品牌。全市累计建成创意休闲农业景区（景点）500 多个，获得“中国最美休闲乡村”“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等部省级荣誉 30 多个。2017 年全市休闲农业接待游客接近 2000 万人次，实现综合收入 57 亿元。二是大力发展智慧农业。深入开展“互联网+”现代农业行动，加快物联网、移动互联等现代信息技术推广应用，农业信息化覆盖率全省领先。大力发展农业电子商务，推进江宁、浦口 2 个农业电商产业园建设，扶持发展一批领军型、成长型农业电商主体，促进农业电商集聚发展。今年上半年，全市农业电子商务主体数量达 3500 多家，农业电子商务交易额 42 亿元。连续两年成功举办南京国际智慧农业博览会，社会影响不断扩大。三是大力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深入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业，形成一批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军企业和国内外知名品牌，全市规模以上农业龙头企业加工产值占农业总产值之比达 3.2:1，位居全省前列。

四、坚持机制创新，增强农村发展活力

以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为主线，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更加注重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服务主体，加快构建各类主体相互依存、紧密协作、共融共生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一是深入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按照“一年扩大试点、两年全面推进、三年基本完成、四年攻坚扫尾”工作部署，创新运用“六步工作法”，确实权、颁铁证，历时 4 年，6 个涉农区全部通过省市级联合验收，在全省率先全面完成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全市发放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 45.3 万本，发证到户率超过 98%，承包面积溢出率超过 20%。全面完成 700 个村 9690 个组集体资产清产核资，为全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提供“南京方案”。二是培育壮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高质量发展，大力培育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龙头企业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目前，全市农业部门累计登记家庭农场 3000 多家，成立农民合作社达 3905 家，全市农民参加合作社比重达 80%，培育了市以上农业龙头企业 189 家。加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政策扶持，2015 年起建立“金陵惠农贷”和贷款财政贴息政策。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加快推进，在全省率先制订出台《南京市引进青年大学生新型职业农民学费补助实施办法》，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程度达 55%。三是大力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创新农业公益性服务有效供给机制和实现形式，大力支持经营性服务组织发展，积极发挥农业企业、

专业合作社和专业公司等主体的作用，深化水稻种植“十统一”服务和农机作业、病虫害统防统治专业服务、农业社会化服务，形成了艾津植保等一批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

五、坚持绿色引领，增强农业生态功能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坚持把农业资源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快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生产生活方式。一是深化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科学规划畜禽养殖禁养区，落实禁养区关停和限养区整治长效机制，全市畜禽禁养区共计 4058.3 平方公里，占全市土地面积的 61.55%。积极推进非禁养区规模养殖场治理，规模畜禽养殖场治理率超过 72%，治理进度位居全省前列。提高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水平，加强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支持规模畜禽养殖场开展粪便综合利用。2017 年，全市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率达 92%、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率达 93%。二是加强农业资源保护和高效利用。实施耕地质量提升与保护行动，积极推进耕地轮作休耕试点，建立一批市级以上耕地质量提升综合示范区，累计建设了各类耕地轮作项目 20 万亩。加强长江江豚、长吻鮠铜鱼、中华绒螯蟹水生生物自然保护区、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建设，启动南京长江江豚种群科学考察活动，建立 6 个固定观测点，全年观测到江豚 2384 头次。三是大力推进农业清洁化生产。深入实施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行动，加强农作物病虫害监测预警，推进植保专业化统防统治，做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示范指导，有效降低了化学肥料和化学农药使用量。2017 年，全市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使用面积占比达到 78%，测土配方施肥覆盖率达到 92%以上。四是推进生态循环农业发展。立足种养平衡发展，综合考虑环境承载能力，合理优化种植养殖规模，集成推广高效、绿色、安全种养技术，探索多种形式适合规模经营的新型农牧结合、农渔结合、生态种养等模式。建设一批生态循环农业项目，示范引领面上整体工作提升。

六、坚持依法行政，增强农业公共服务水平

坚持把确保农业安全生产作为监管工作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健康安全需求，切实筑牢民生安全保障第一道防线。一是强化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普查、例行监测和监督监测，建立健全农产品质量安全诚信体系和追溯体系，确保主要农产品例行监测合格率稳定在 98%以上。完善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络，落实定人员、定对象、定目标和年终考核的“三定一考核”制度，完善检打联动机制，进一步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探索建立与市场准入相衔接的农产品产地准出制度，共同推进农产品质量全程监管。二是强化农业安全生产。坚持把安全生产与业务工作同部署、同落实、同检查考核，扎实开展动物疫病防控，强化动物卫生监管，加快生猪屠宰行业清理整顿，规范有序开展病死动物无害化收集处理，进一步强化动物防疫、屠宰监管、兽药管理风险评估工作。加强农村沼气管道安全生产检查，扎实推进“平安农机”“平安渔业”建设，建立健全隐患排查治理体系和安全预防控制体系。三是强化农业法治建设。加强涉农法治工作，以“两随机一公开”为基本要求，以“推进农业执法迈入全国先进行列”为目标，坚持向体制机制聚焦、向能力建设着力，创新监管方式，提升执法效能，扎实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动物卫生监督、农（渔）业资源保护及农机安全执法，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作者：江苏省南京市农业委员会主任）

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全国人大农业与农村工作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送：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 有关部委司局、全国各省农委(农业厅) 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各研究所
发：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农业经济技术研究所各处、室、中心及下设机构

总 顾 问：刘 坚 卢继传

副 主 编：辛 梅

网 址：www.zhongguanyuan.com.cn

电 话：010-59193366 59195293

010-66117652 57206299

地 址：农业农村部北办公区 16 号楼、18 号楼

主 编：胡兆荣

责任编辑：孙正恩

邮 编：100125

邮 箱：zgynjs@163.com

moagov@163.com

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南 3 楼、4 楼

